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周恩来谈人生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周恩来谈人生

文章摘选

1. 论精神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吾国国民之道德，可谓已达沦丧之极。江河日下，挽救无人。夫事实处于危险之境，但使国魂尚在，犹可挽回。盖罗马虽亡，玛志尼尚因民气以重兴。匈牙利属奥，噶苏士尚藉民德以建自治。是国虽亡，且隶他人篱下，国性未泯，尚可为也。然而吾国于精神则何如！在朝者处现今之时势，国务员私利之争无时或息；议员欲得优薪，督军竟思攘利。在野者或自命圣哲，启宗教争端；或自命清流，置国事于不顾；或灰心国政，作种种不道德之举，以为亡国之预备；或聚集金钱，以作富家翁。凡此种种，无非泯国性，丧国魂。使国果亡也，彼等恐亦无寻乐税驾之所。至一般无智愚民，昏昏噩噩，不知国家为何事者，按之以国性国魂之说，尤格格不相入矣。

由此以观，证之于事实既如彼，按之以精神复如此。呜呼！危险之期，困难之境，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也耶？然而国诚危矣，吾党青年，际此时势，知之可，欲奋起而救之则力有来足。恐谦让未遑，故吾今日之言，愿吾最可敬可爱之同学，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而不欲有弱冠请缨之举，于国事无大补也，幸甚幸甚。吾兹请以校长之言以终吾篇：“作何事时作何事”。

注释：

本题节选自南开学校 1916 年 11 月 8 日出版的校刊《校风》第 45 期第 1—5 页的“代论”《中国现时之危机》的第二部分。

原刊为“似”字，误排。

2. 试论奢靡二说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世恒言曰，一国文明之进退，视其国民生活程度之高低以为衡。英霸全球，工艺商业执大地之牛耳，其国民之生活，亦较他国为高。德美文化居于后起，勇往直追，其国民之生活遂亦亚于英。至若扶桑，则其维新不及半纪，文明新机，方在萌芽时期，故其国民生活，远逊于西邦。其他亡国之民，若埃及、若印度、若安南、若朝鲜，其生活程度之低，非可与英美相较而语。而其国之文明亦暗淡无光，永无发轫之望。是国民生活之高低，与其国文明之进退，实处于相维系之境也。返观我国，开放门户四十余年，而所谓国魂所凭、国性所寄之文化，非仅无进步可言，且模效无着，凭依失所；大多数国民生活，几与埃及、印度、安南、朝鲜同其高低。呜呼！兴邦之道耶，覆国之象耶？是固不待智者测也。然吾又闻诸今之忧时者言曰：国匮民贫，由于世风奢靡。诚若是也，英美德日国民生活程度之高于我者，国宜匮矣，民宜贫矣，而蒸蒸日上，厕于强国者，何哉？埃及、印度、安南、朝鲜国民生活程度之低于我国者，国宜强也，民宜富也，而日就式微寝至国亡种弱者又何哉？由是观之，世风奢靡，由于人种习性，生活程度之高低与之固无关也。盖世界文化有进退，人工之时代，进而为役物之时代。十指所勤，毕生所经，本能所具有也。以物互市，以信交易，资本之无营，利息之无着也，故其时无所谓生活之程度也。逮人类渐繁，人力乏效，于是驾车有马，耕地有牛，司晨有鸡，守户有犬，富而贵者役物之力伟，贫而贱者役物之力微，而生活之问题斯起矣。及于今，役物之时代，进而为汽力之时代，盖世界无穷，人欲无尽。动物以有穷有尽之本能，供役其间，行见有左支右绌之象，故汽力以代物力。一物之微，经若干手续始成，寻常之品，务极其巧思，以求合用，无所谓敷衍，无所谓勉强也。生活程度，遂亦因之以增高。人工束手但尽巧思，此现代之文化也。按诸英德，有倡电力光力以代兴汽力者，艰而未见实行。至在吾国，则汽力之兴，仅见诸二三工厂，他何有焉。此英美德日所以趋于强盛，而吾国所以日就于衰弱也。英德美日之奢靡所以出于正，而吾国之奢靡所以出于劣也。夫奢靡习性之恶者，然而施之于文化进步之国，则其因生活程度之高，虽奢靡不得谓之奢靡也。若吾国，文化黑暗，生活低微，举国痴顽，如人昏梦，虽欲与世界诸强同其步趋，亦将谓之奢靡。矧财隐于地，货弃于途，中土菁华，外人攫得，嗟我小民，流离颠沛，满目荒凉，而社会变本加厉。踵事增华，耗费金钱毫不顾惜，又远超于文化进步之邦，此而不为奢靡，天下宁复有奢靡之事乎！且奢靡之中于吾人习性，非自今日始也。桀纣幽厉，三代之主也，德不足以服人，功不足以惊世，而其服御之华，宫室之美，姬妾之众，狗马之嗜，直超历代帝王而上之。当世未闻有起而抗者。逮忠良退隐，贤死谏醢，暴声大著于天下。汤武犬戎，始得吊民伐罪。设桀纣幽厉有知机之明也，龙逢不死，比干不杀，烽火不兴，则汤武犬戎无征讨之名，桀纣幽厉虽肆其奢靡，不为害也。是故一代之兴，宫室车马姬妾服御之增，亦因其势为转移。宋祖之遵母训，明祖之爱惜民物，盖仅见也。富贵之家，人不越黄金百镒，而出支已浮原额。贫贱者力本不足，犹摇尾以厕富贵之列，好高务远从事奢靡。非生活程度之有以使之，实国人之习性然也。按之于波立比阿奢靡由于习惯，纪夏井奢靡由于性质之说，益恍然于国人之奢靡由来矣。或曰：二氏之说，容有异乎？噫，是岂知言也

哉！夫人性本善，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怒。世风浇漓，习俗日偷，故今之习恶者易于古之习恶者。习久成性，恶风遂被于社会，而世人亦不以为怪。是以唐虞之世所盛行者，今人转以为非。其所恶者，今人方盛行之矣。孰谓天下之习惯不易改，而性质难掩也哉。且波利比阿马其顿之士也，是时希腊方亡，文化新产，人性犹异，故希腊未季奢靡之风，波氏惧传之马其顿，遂不惜大声疾呼，明奢靡为习惯，冀国民知返本去华。奢靡为身外之虚假。故欧人及今，犹不失为俭朴之民于生活高尚中也。至纪夏并则日本之士也，去今未逾半纪，距上古醇俗厚风之世，已将望尘不及。故其发为言也，则曰奢靡出于性质。盖习久成性，奢靡本属习惯，及今则无所谓习矣，性焉而已。矧日本地狭民稠，设奢风普于三岛，则图强非易，行且流于贫弊之邦矣。故纪氏虑日人之不求文化，步武欧美，而惟生活高尚是务也。于是揭性质之帜以冀日人聆斯言有所动于中，知性质之非易革，而遂致力于俭朴以力矫之也。瞩目东瀛，其国民勤俭朴实之风，未始非纪氏之力也。夫二氏之居心既若是，其所见诸言论者乃有所判。实则习久成性，习惯也，性质也，固一而二，二而一也。况奢靡用之于文化日进之国，则其奢靡且足以助文化之进步，非徒无舍己也。若盛行于吾文化蔽塞之邦，则吾行见其促国于亡，以应夫忧时者之言而已。呜呼！习惯也，性质也，奢靡也。炎黄苗裔，将恃之以增进文化，与英、美、德、日同列于富强之境，生活高优之所耶！抑采之为匱国贫民与埃及、印度、安南、朝鲜同厕于亡国之列生活低微之邦耶？从波从纪，是故在吾人之自择也！非二氏所得而过问矣。

注释：

本题选自南开学校 1916 年 11 月 23 日出版的校刊《校风》第 48 期第 12—15 页。原标题为《今之忧时者金谓国匱民贫由于世风奢靡然泰西学者研究奢靡问题界说不一波利比亚谓奢靡由于习惯纪夏并谓奢靡由于性质二说然否试探本言之》，选编时，标题简化。

安南，历史上曾是法国的殖民地（保护国）。19 世纪中叶法国开始武装侵略越南，到 1884 年越南王室被迫与法国签订投降新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将越南分为东京、安南，交趾支那三部分，分别建立殖民统治政权。

原文如此，似为“厉”字之误。

原文如此，似为“骛”字之误。

3. 觉 悟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

什么是“觉悟”？

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自觉，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这种活动全可叫他为“觉悟”。

为什么“觉悟”？

人生最大的要素是灵性。灵性包含有理性同群性；理性的冲动，可以主宰一切事理；群性的冲动，可以变更社会的环境。这种冲动的作用，全由于“觉悟”中生出来的。

人生的环境，因着时间、空间种种的不同同变迁，遂逼着人生出“觉悟”；或者人因为各种事理的不同同变态，也生出许多“觉悟”。总起来凡人不同意现状，必生出感觉；由感觉而悟到一切真的事理——为人类大多数生存进化，比较现状为有进步的——是谓之大“觉悟”。

怎样“觉悟”？

“觉悟”的要件，必须自己去“觉悟”。自己“觉悟”，有静的内省法，从回想而生出“觉悟”；有由他人的方面，从考察中生出来的“觉悟”；有因环境的感动，从比较中生出来的“觉悟”。

所谓“回想”、“考察”、“比较”，真正的主旨，还须本乎真理冲动的现象。

“觉悟”的影响——

因自己的“觉悟”，得寻着真“人”的生活。由己及人，渐渐可以达到人人“觉悟”的境界。

从“觉悟”中生出来的效果，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望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纵横起来说：横性的“觉悟”，是利己利人，永无边境；纵性的“觉悟”，是解放改造，破坏建设，永无止境。

注释：

本题选自觉悟社 1920 年 1 月出版的《觉悟》杂志创刊号。按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影印本刊印。

4. 在死难烈士前面， 不需要流泪的悲哀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

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回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五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五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行刑。他们四人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都为之掩面。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四同志死时的枪声，狱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但是，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然他们领袖之英勇的战绩，却永远地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湮灭！

当着彭、杨五同志初被捕时，南京国民党中央便得到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夸功报告。他们的回电是命令熊式辉着即枪毙，加以刺蒋案件忙得这班走狗们寝食不安，所以枪毙的执行乃更加迅速。

阶级斗争剧烈的今日中国，革命的群众、革命的领袖死在敌人的明枪暗箭中的不知几多！这原是革命成功前所难免的事变，而且是革命成功之血的基础。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每一个革命战士的牺牲，不管是在前线，是在后方，都有他伟大的代价。尤其是革命领袖的牺牲，更有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所以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的确，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革命的领袖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新的领袖。故敌人消灭我们肉体的办法，是压迫革命之最残酷最恶毒的办法。我们只有努力于群众的斗争，加紧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力量足以消灭白色恐怖，消灭敌人的屠杀，则革命的胜利便将临近，敌人的统治便届末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偿赎今日的损失！只有这样，我们才尽了彭、杨四烈士的遗志！才报了我们的被压迫阶级的大恨深仇！

注释：

本题节选自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捕杀经过》，题目是选编者加的。

颜昌颐（1898—1929），湖南安乡人。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中央军委、湖南省军委工作。1926年10月到1927年8月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四师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后，和彭湃一起发动海陆丰第三次起义，创建海陆丰苏维埃，任红军党代表。192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

彭湃（1896—1929），广东海丰人。我党员早的农民运动领袖。1922年7月在海丰县赤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会。1923年1月当选为海丰总农会会长。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1925年5月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失败后，领导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创立海陆丰苏维埃，任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在党的第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杨殷（1892—1929），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是省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并曾代理人民委员会主席。1928年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长。

邢士贞（1903—1929），山西汾西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干部、士兵运动负责人。

5. 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时代。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要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这时代是战斗的。这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这一次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现在是整个被压迫、被屠杀、被奸淫、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的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所以现在的形势全变了。在国家环境整个的变动下，青年在这时代里所占的地位是最闲难而又最重的。如今我们青年再不能如过去那样地学习，我工作，结婚……再也不能依照平常的生活程序过日子了。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文化中心的京、沪、平、津、粤、汉，已去其四；后方的学校，也多半停了课；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飘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然而我们应该骄傲，应该自豪。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大的动乱的时代里。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我们青年不仅有今天，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他不仅管自己的一生，而且还要管及他的子孙，他的后代。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使它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国家。

因此，我们想，在积极方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年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这机会在平常是很难找到的。

注释：

本题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88—89 页。

6. 论鲁迅与郭沫若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要并论鲁迅 和郭沫若，我以为首先要弄明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两人的经历，是多少有些不同的。

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清朝，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人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虔诚地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瞿秋白同志说得好：“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蔡子民先生也说：“为新文化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鲁迅所努力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着了黑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坟》）这就是鲁迅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他自己愿做“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同前），其实他就是这过渡时代的伟大桥梁。

郭沫若的时代，却稍为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是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就拿经历说，他既没有在满清时代做过事，也没有去北洋政府下任过职，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我们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前一辈子的人，而应看成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人，虽然他比鲁迅也不过只小了十一岁。我们也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物，而应看成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虽然他在少年时代也曾舞文弄墨过一番。

因此，我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献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便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连和误会了。

鲁迅先生在思想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上之非常可宝贵的革命传统，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已经指出四点：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都是非常之对的，我在这里不想再说了。要说的是郭沫若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二十五

年当中，所给予我的印象和我所认识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于人类的热爱。当“五四”觉醒时期，当创造社草创时期，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谛克，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的革命烈火，却决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一旦抗战号响，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了。四年多抗战，不论在他的著作上，在他的行动上。都可看出郭沫若仍然是充满着革命热力，保有着当年热情的郭沫若。可是时代究竟不同了，客观的事实不断地教训着我们充满了革命热情的郭先生，于是郭先生有时竟沉默起来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久已代替了革命的浪漫谛克主义，郭先生已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了。

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虽然有些论据，还值得推敲。如果说，连卢那察尔斯基都不免在退潮时期入了迷途，那我们的郭先生却正确地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现在郭先生似乎又清闲了，恰好为纪念他的二十五周年创作生活，大家主张集资建立沫若研究所，我想，这是最好不过的事。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

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的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也正因为这样，初期创造社才能为革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才影响了后期创造社在思想意识上的一些论争。自然后期创造社的争论已多少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秋白语），可是鲁迅先生也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艺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问题……以纠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同时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辩白的，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周先生在《两地书》（六九）中明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章。”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广州事件后，郭先生曾邀鲁迅先生参加创造刊物，列名发表宣言，不幸因新从日本归来的分子的反对联合，遂致合而复分，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斗争的发展。这从“切磋”的观点上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但是，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一直影响到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那真是不应该了。有人说，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

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我想，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字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

这些，也就是郭先生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

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

注释：

本题节选自 1941 年 11 月 16 日《新华日报》（重庆版），标题是选编者加的。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多种，已编为《鲁迅译文集》十卷。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家、文字家和革命活动家。

原文为“谦”，改为“虔”。

原文漏排此字。

原文为“供”，改为“贡”。

原文为“救”，改为“纠”。

7．我的修养要则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 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注释：

本题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5 页。

8.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

二、领导者的立场。

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但这样说太简单了，分开来具体说说，有以下几点：

- (一) 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 (二) 要有坚持原则精神。
- (三) 要相信群众力量。
- (四) 要有学习精神。
- (五) 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
- (六) 要有高度的纪律性。

三、领导者与领导机关。

(一) 集体领导与按级领导——领导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

(二) 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这一方式。

(三) 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

四、什么是正确领导？

我现在按照斯大林说过的三点 来加以说明：

(一) 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二) 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首先，要经过组织计划和指示的执行之讨论。次之，要慎选人材，负责计划之执行。再次，要组织斗争，来实现党的计划。又次，还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这样，就能从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之是否正确和是否需要补充。

(三) 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这种审查的方法：(1) 不根据允诺，而看工作结果；(2) 不根据室内纸上计划，而看实地情形是否做了或是否敷衍；(3) 不看形式，而看内容和实际是否正确地执行或被曲解了；(4) 不仅由上而下，还要由下而上地审查；(5) 要有系统的经常的审查；(6) 要有领导者自己参加。

这一切，正如斯大林所说，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只有这样，领导才是正确的。

五、领导者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用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这是真理。分开来看，我以为：

(一) 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这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加强自己的政治锻炼，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 注意大事；(2) 提高政治警觉性；(3) 提高理论水平；(4) 加紧党内外思想斗争；(5) 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成绩。

(二) 要求领导干部抓紧组织领导。有了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 要使组织领导提到政治领导的水平，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2) 要使一切组织和实际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计划的实现；(3) 要注意日常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接近于下层，工作更具体化；(4) 要动员组织和群众，为克服工作中一切困难而斗争；(5) 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等。

(三) 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这也是组织工作之一，不过可以单独来说。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斯大林曾指出用人不依原则的危害于党。他指出这种人到什么地方，都是“随员”一大批，专用所谓“自家人”。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也批评这种人的不老实，而过去“钦差大臣满天飞”就犯有这种毛病。有了政治信任，用得其当(适时适地适合条件)也很重要。

(四) 审查工作。审查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之执行情形。审查的任务如斯大林所说，第一是认识人材的品质，第二是查明执行机关的优缺点，第三是查明工作计划或指示本身的优缺点。有人以为这样审查容易暴露自己弱点，有损领导威信，或动摇自己信心。这是不对的。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消弱。只有那种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

(五) 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 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 倾听群众意见；(3) 向群众学习；(4) 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六、领导群众，结交朋友。

(一) 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二) 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

(三) 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四) 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

(五) 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七、领导艺术。

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

八、工作方法。

(一) 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

(二) 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

(三) 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

(四) 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五) 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

命令的方式。

九、工作作风。

（一）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二）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三）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目前，特别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

注释：

本题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8—132 页。

斯大林说过的三点，原文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45—146 页）。

见前述斯大林著作（《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39—140 页）。

参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41 页）。

9．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

……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当时认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是失败的，曾给他处罚，解除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处罚了其他同志。事实上毛泽东同志的秋收起义是成功的。他把起义的农民武装和武汉的警卫团带出来，到了井冈山，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以后的中央苏区。南昌起义时，谭平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他也因犯错误被开除出党。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如果给他别的处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是会好些的。当然谭平山是有错误的，但张国焘也是有错误的。张国焘当时也受了处分。我和李立三也受了处分。

注释：

本题节选自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题目是选编者加的。

秋收起义，指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0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人。1920年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27年南昌起义时，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十一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开除党籍，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的实国独裁政策。1948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1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1979年死于加拿大。

10．鲁迅和闻一多都是
我们的榜样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

注释：

本题节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40—241 页。标题是选编者加的。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痛恨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1945 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6 年 7 月 15 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1．为庆贺朱总司令
六十大寿的祝辞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

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我愿代表那反动统治区千千万万见不到你的同志、朋友和人民向你祝寿，这对我更是无上荣幸。

亲爱的总司令，你几十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亲爱的总司令，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贰，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信心向前迈进！

在我们相识的二十五年当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

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

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你现在六十岁了，仍然这样健壮，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亲眼看到独裁者的失败，反动力量的灭亡！

你的强健身体，你的快乐精神，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必然兴旺。

人民祝你长寿！

全党祝你永康！！

注释：

本题选自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5—246页。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辛亥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朱德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云南起义，指1915年12月25日在云南爆发的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朱德按蔡锷亲笔信要求，在蒙自发动讨袁起义。

北伐战争，指1926年5月开始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由于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篡夺。朱德当时按照党的指示做争取四川军阀杨森的工作以配合北伐。

南昌起义，指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直接领导下，在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起义军曾一度占领南昌，后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南下，后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东江地区活动，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南昌起义的

意义在于它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土地革命,指 1927 年至 1937 年的第二次革命战争,又叫“十年内战”,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国内革命战争。朱德直接参与领导了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指 1937 年至 1945 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国共两党合作下进行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朱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司令,参与领导了抗日战争。

生产运动,指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军民为克服日本侵略军野蛮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而造成的严重经济财政困难,所开展的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个运动收到巨大成效。朱德亲自参加并领导了这个运动。

12．领导作风的
一个重要问题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

对许多思想上作风上确有问题的同志，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信任他们又抓紧做他们工作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风。因为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上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该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这些人既是基本上好的，虽有严重而多的错误，我们只能在信任中抓紧，而不应置之不理，冷淡起来。否则，领导者自己就无法批评他们的错误，反使自己陷于被动。要做领导者，必须团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然后抓紧他们，称赞其对的方面，批评其坏的方面，然后才能改造他们，同时也就改造了自己的领导。

注释：

本题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

13．学习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向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在今天这个会上，我想把毛泽东同志如何值得我们尊敬和我们如何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几点给大家说一说。

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大青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大会的主张，动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道前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就必须认识这个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和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所以在我们青年中，也不要因为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旧书、研究旧东西就认为他们不可以进步，不要因为他们有旧观念就不去团结他教育他，不要因为他落后一点就不理他。只要他愿意进步，就有改造的可能。毛主席说，他自己

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会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些青年人研究问题还没有进到全面，喜欢专心致志地搞一面，我们不要去打消他的兴趣；即使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也不要排斥他，可以慢慢地教育。

我讲这三个例子是说明：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生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恰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所以对那些有迷信的青年，落后的青年，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年，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要去教育他们。我们青年要互相学习，要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跟着他们学习。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这样，同志们中有了骄气就可以压下去了。毛主席都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哪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还值得骄傲？比毛主席差得远！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更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朗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泽东选集》时就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必须使农民运动

深入发展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拥护农民提出的办法，并加以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不过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抗战中要团结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明知道他动摇、消极，但是必须推动他抗日，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既要团结他，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所谓“有团结有斗争”。用这样的策略来进行抗战，使人民自己的力量壮大，这就需要说服很多人同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有一些人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党内也有人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要使这个原则真正实施，就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解放战争比较顺利，但也还有小的挫折和错误。譬如土地改革中，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一直等到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出来了才得到全面的纠正。这都说明，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具体的工作的。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不如此就无法使革命达到胜利。所以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是要实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也说过“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这对于我们青年正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为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像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

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但是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形在今后的工作中遇见的会少了。因为今天共产党的中央不像当年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但是，这也仅仅在大的方向上。譬如说，今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这样大的方向上大家都同意，而在具体的政策、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的争论的。所以需要学习；学习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过程。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能认为把一个简单的口号提出来就算了，就够了；也不能行不通就失望，行得通就自满，不再前进。那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错，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战，有人就说，要团结就不要斗争。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这一次解放战争，在乡村中搞土改，工作中又犯了“左”倾错误。因为要消灭地主，就不给地主土地，或者给地主坏地，使他们不能生活，或者定的封建富农、地主的数量过多。另外，在杀人问题上，本是除估恶不悛、人人痛恨的要杀外，其他可以不杀，但是有时候在群众愤恨之下，没有加以区别，领导没有说服群众，以致杀人过多。这样就使我们阵线中的农民，首先是中农受到影响。这个错误，也是毛主席把它纠正了。从这四个革命阶段可以看出，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观点是要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各个击破敌人。在抗日时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走后，再打倒国民

党反动派，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在乡村中，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反动统治的根基。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围绕着这些口号，把更广大的农民团结在一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一点我们青年要学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

青年联合会最大的作用就是组织全国广大青年，推动与教育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前进。我们联合青年，不包括反动青年，不能让他们钻进来。但是，我们必须把愿意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完全包括在内。这些愿意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青年，思想虽然还不是一致的，但是今天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还有迷信观念，落后观念，或单纯的技术观念和片面的观点存在着，我们也要把他们包括进来。因为我们可以教育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学习的口号和目标，即“学习毛泽东”。这个口号和目标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不仅是进步的青年能接受，其他青年也能接受。当然，团结教育青年，并不是只给大家讲共产党的好主张，不讲共产党犯过的错误。在这个青年会议上，我们不但向同志们隐蔽共产党的错误，相反，有好多错误在今天都讲出来了。我今天讲的一些党内的事情，你们过去是不晓得的，甚至党内有的同志也还不晓得，可是你们今天就晓得了。今天你们所代表的，不是几百万青年，而是几千万上万万青年。那就要请你们考虑，共产党不能冒昧地把他的主张压在成千成万的青年头上。这样的思想是国民党的统治的思想，人家不能接受硬叫人家接受，把帽子在人家头上一戴，像观音菩萨的紧箍咒一下子箍在孙悟空头上。学习毛泽东，我们不是用压迫的方法。这只是我们提出来的口号，这口号很响亮，能使广大青年接受。因为毛主席在今天不单单是中国青年的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思想自由的问题。反动派常常说他们主张思想自由，蒋介石就是这样说的。大家知道这是鬼话，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还有什么自由呢？人民普遍地受压迫受剥削，只有少数的地主官僚资本家反动分子有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剥削、压迫、屠杀人民。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广大工人农民没有思想自由。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除了反动的思想不允许宣传外，其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是自由的。共产党认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个当然要讲。但也不是不让这个思想以外的思想存在。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才是一个教育的态度，领导的态度，才是一个共同工作的态度，合作的态度。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毛泽东”，但也不限于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经济的政治

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

我讲这样几点当然不是介绍毛主席的全部功绩和主要学说，我说的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很少的一部分。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方面的成就，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文章，在文化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上的创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等等，多得很。毛主席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而且精，在这里不多说了。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在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他就是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正如斯大体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所说，既有着革命的胆略，又有着求实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态度、作风上，也就应该老实，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运动中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在过去也是急躁的。当然这不是青年一代很容易学成功的。我们要兢兢业业，力求少犯错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筋斗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后，不要气馁。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不知流过多少血，遭受过多少挫折，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要有这样的志气，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今天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光明在照耀着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觉得不可一世，而忘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很艰苦困难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有两个教训值得注意：一种教训是看不起别人，脱离群众；一种教训就是蜕化了。这是我们青年的“敌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动上万万的青年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全国人民的民主解放和民族独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且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注释：

本题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第 326—343 页。

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9 年 5 月 4 日至 10 日在北平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后改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范文澜（1893—1969），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在党的第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汉学，亦称“朴学”，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清朝的一部分学者用汉儒的方法研究经典，注重一字一句的考订，称为汉学，以与宋儒空谈义理的“宋学”相对立。汉学对整理古籍，辨别真伪，有不少贡献，但往往流于为考据而考据的倾向。

这是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 1187—1204 页）。

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7 页）。

14．思想改造应该
先从自身做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

思想改造，是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斗争的。知识分子各种出身都有。中国五四运动以前，封建的传统教育影响比较深，新式教育是以日本教育为主流。五四运动清算了封建思想，又进来了美国的思想，并且在教育界占据了主要的地位。现在要重新清理我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容易的。美国军事上政治上侵略中国是彰明昭著的，最近几年的侵略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思想影响就不那么容易识别。许多人经过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期熏陶，不知不觉地就受了影响，而且还觉得它好。当然，每个人所受的影响有深浅的不同。但首先应该承认有这种影响，才能自觉地进行清理。清理旧的思想影响，需要经过长期的自我批评和斗争。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理论要同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就是空话，于事无补。思想改造应该先从自身检讨做起，这样就能够说服别人。不要天天攻击别人，打击别人，混战一场。

注释：

本题节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出版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的《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题目是编者加的。

五四运动，指 1919 年 5 月 4 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15．跟着新生力量走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

其次是对工作怎样看，是发展地看还是固定不变地看。一切事物总是从幼芽渐渐成长壮大，不会一下子就十全十美。初生的婴儿不如大人好看，但人就是从这样的婴儿经过幼年长到成年的。花草果木是这样，科学发明也是这样。发明创造一般也是经过多次失败最终找到规律才成功的。我们的工作很难一开始就十全十美，完全合乎理想。当然，理想是需要的，它可以为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但是理想必须从现实的努力奋斗中才能实现。不这样辩证地看，对现实就会感到失望，对前途也会失去信心。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同学们到工作岗位上去就要这样做。从学校到工作岗位，仅仅是工作的开始，要看到将来的发展和变化。不要一接触实际、碰到问题就失去前进的信心，或是一搞技术性的工作就觉得无聊乏味，担心会老死于此，没有前途。每个人一出校门都感到非常美满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才能创造美好的前途。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发展地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需要我们去巩固、去发展、去创造，才能达到独立富强的境地。所以对于工作岗位，不要只看今天，还要看到明天，当然也不要只看明天，而逃避今天。只看明天就要溺于空想，就不会安心于目前的工作。要知道机器上的每个螺丝钉都有它的作用，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比如要开好今天这个动员大会，会场上就需要有不同的分工，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圆满进行。再如音乐队和各种集体活动，每个人都需要密切配合，这样才能和谐。

空想前途不对，反之，看不到发展，也会使我们变得庸俗，成为无理想无头脑的工作器具。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是要使用工具，而不是将自己变为工具。所以，我们一方面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想，另一方面也反对一入社会就因为家庭担子或个人问题而庸庸碌碌。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不脱离现实，而又看到前途，这样，我们的方向才会更明确起来。

此外，我们选择新生的方向，跟着新生力量走，还要不怕困难。你们学过社会发展史，知道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人就是从不断克服困难中发展起来的。在发展中，像尾巴一类无用的东西渐渐退化了，而双手却解放了，生长了，这就是因为用手攀缘树木、制造工具、不断克服困难的结果。困难使人增长了智慧。工人阶级所以有先进的思想，是因为他掌握了机器，从事集体劳动，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努力克服困难的结果。

自然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从困难中锻炼出来的实例。暖房里花总赶不上风霜中的常青松柏，闺房里的小姐、富人家的少爷就赶不上千锤百炼的勇士。同学们到社会中来，就要勇于迎接困难，克服困难。

刚才郭沫若副总理提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其实那时也是由困难逼出来的。中央红军在江西遭到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正确意见，犯了错误，挡不住敌人，于是才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带着八万多人的队伍长征。当时的困难很多，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停住就会被消灭，只有不断地克服重重困难，才能从困难中走出来，到达陕北。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处理问题要想到好的一面，也要考虑到坏的一面，好的要去争取，坏的要准备去克服。任何事情从这两方面去着想，就不会出毛病了。

对坏的作充分估计，遇到困难和挫折才不会感到意外，以至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而是有力量去克服。当然，如果出现好的情况，这正是我们所要争取的。

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斗争中辩证地发展着的。慨然我们要工作，就必须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青年人应当有这样的勇气。第一要有勇气，第二才能产生智慧。有勇无智固然不好，但如果连勇气都没有，那就毫无办法了。要有勇气，也就是要有革命热情。你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尽管只有几十个人，就有勇气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口号。三十年如一日，由于坚持了革命斗争的方向，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今天的胜利。在总的方向下，虽然也不免犯错误、出偏差、走弯路，但就在这样长期斗争中生长了智慧，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一个人也要这样富有勇气，敢于接受困难，让困难来磨练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我们要不怕敌人，要在和敌人斗争中锻炼自己。毛主席说，我们的老师不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和人民大众、还有第三个“老师”——我们的敌人。像蒋介石就做了我们二十二年“老师”，没有他就不能锻炼出五百万解放军。我们目前还有一个“老师”，就是美帝国主义，它使我们的人民从同它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跟着新生的力量走，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并具有不怕困难的精神，这才是正确的。

.....

此外，我还想说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听说学校在进行民主评定时，有人害怕，也有人满不在乎。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在一块儿上大学四年了，大家非常熟悉，彼此批评一下是有益处的，可以促使我们更快地进步。同学中也许会有人找岔子，但这是个别情形。有人说，挨批评多就是因为做事多。我想，这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做事当中，难免要产生一些缺点和错误，自然就会多受一些批评。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做事了，免得人家批评。这样说就不对了。多为人民做事是好的。有觉悟的人，就要多做事情，多为大家服务，多听取别人的批评。我们对批评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如果脸红脖子粗，不接受批评，就是没有修养。我们不要怕批评，假使人家不了解情况，说错了，可以善意地加以解释；就是恶意的批评，日子久了，群众也能够识破。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批评，尤其是青年团员、共产党员，如果有人批评我们，更应该认真听取，检查自己。中国古代的曾子尚且“吾日三省吾身”，常常想想自己，何况我们。我们的解放军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在“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中，要求自己很严格，想到阶级仇、民族恨，想到自己的错误对革命事业的危害，自我检查时，很多人都哭了。知识分子爱面子，这主要是旧社会造成的。我们应该丢开这个“面子”，严格要求自己。今天我们有了相互批评，这就是民主的开端。别人的批评是否完全恰当，当然很难说，我们不要过于苛求。不要说别人的批评，就是连自己的反省也不见得都很恰当。只要我们做到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会锻炼得更好。

在学校里，我们常说要为人民服务，现在分配工作了，就要付诸行动。到农村去，青年团员应该带头，有觉悟的人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如果工作适合自己的兴趣那自然好，如果不适合，也应该去。青年人要不断地磨练自己。鲁迅是大文学家，但对任何一件小事都不苟且，例如他对青年的来

稿就是每一个字都仔细校阅，认真修改的。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有的同学担心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够，这如果是出于虚心那是好的，但不要失掉信心。我们要做到老、学到老、要有信心，要勇敢地接受工作，在工作中不断地锻炼、提高。当然，也不要骄傲自满。毛主席告诉我们：第一不要骄傲，第二不要急躁。青年人骄傲自大是非常危险的事，这会阻碍自己进步。

注释：

本题选自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出版的《周恩来教育文选》中的《跟着新生的力量走》，略有删节，题目是原来的。

曾子，名曾参（公元前 505—公元前 435），孔子得意弟子。字子舆，后人尊称曾子。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吾日三省吾身”是他提出的修身养性的千古名言，见《论语·学而》。

指用三查和诉苦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一个重要的运动。“三查”和诉苦是指在人民解放军中发动广大指战员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的痛苦。

16．为了实现和巩固团结
必须消除门户之见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为了有效地工作，科学家必须团结。说到团结，很容易想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在阶级社会中，人类是划分为阶级的。有阶级的区分，就有阶级的斗争和阶级的团结。我们的国家是多阶级的国家，今天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团结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还需要继续与自然界作斗争，仍然需要团结。与自然界作斗争是无限的，所以团结也是长久的。自然科学家当然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内部还有破坏团结的因素存在，所以团结问题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划清界限，分清敌友。团结谁？反对谁？团结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凡是承认《共同纲领》的都要团结。不论是私人开设诊所的医师，或是在私人工厂中服务的工程师，今天都是需要的。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有限，不能立刻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因此还需要私人开业的医生的帮助，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是有益的。所以，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目的是要打倒共同的敌人。现在国内的敌人已经打倒了，国外的敌人还存在，尤其是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必须与破坏人民事业的敌人作斗争，这就是团结的前提。我们反对甘心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少数堕落的科学家，但有一些科学家是被动的、盲目的，或者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条件下跟着敌人走的，我们很愿意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科学家最易于接受真理，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服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要进行说服工作。人民同他们没有私人的恩怨，只有对反动派的共同仇恨。

各民主阶级团结起来了，科学家一定会比其他人团结得更好。

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自然科学是分门别类的，大家所学的不可能一样，各人所努力的方向自然也不同，但是不能因此而有门户之见，互相歧视，如学这一门的看不起学那一门的，在同一部门中这个学派看不起那个学派。我们的自然科学，有许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学医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门户。同样，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农业、交通的人，也有这类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受旧社会的影响形成的，很不利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今天我们要强调集体合作，抛弃那种旧的影响。各方面有备方面的长处，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当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

中国共产党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是决心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党内同志尽管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各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局限，相互间容易产生隔阂。如长期处在农村游击环境中，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互相隔离，产生了山头主义，形成了门户之见。又如在白区的革命工作者，长期处在秘密的环境中，容易产生只看到局部的倾向；而在根据地工作的同志，则习惯于一切公开，容易忽视秘密工作。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工业发展的程度不高，社会主义传统不深。在共产党内，党员的出身和成分不同，也容易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我们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经过两三年的整风，迎来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增强了党的团结，使我们党在日本投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解放战争中更加显出了力量。以上是说在共产党内也还存有门户之见，需要整风。难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团体，在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就能够一下子很理想地团结起来吗？

我们不能空想，不能凭主观，消除这些门户之见一定要经过一个自觉的过程。要面对事实，才能寻找出正确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一个科学团体中，人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是很不容易聚集在一起的。共产党员过的是集体生活，在战争时期生活在同一队伍之中，而科学家是一小群甚至是极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工作的，因此养成了各种不同的性格。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们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要了解生活环境可以影响脾气，既然环境变了，脾气也是可以改的。

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筋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旧社会，反动派利用知识分子的弱点，孤立他们，分裂他们，这样来操纵他们。人民的国家给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逐步消灭一切束缚人类发展的阶级和反动势力，实现真正的进步和自由。以全人类的力量来和自然界作斗争，这是多大的自由，多大的个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个性得到正确的发展。不然，这部分人的个性发展了，就排斥和压迫另一部分人，这叫什么个性的发展？在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少数人无止境的欲望，妨碍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个性发展是专制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我们集体主义者反对这种个性发展。我们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今天的胜利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得到的。我们今天抬头、翻身、开步走了，我们应该在团结上努力，携手共同前进。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战乱，我们是欢迎和平的。我们有信心在这一辈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注释：

本题节选自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2 月出版的《周恩来经济文选》中的《建设与团结》，题目是选编者加的。

整风运动 指中国共产党自 1942 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月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这次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7.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 和马校长 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告诉别人：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认识了，同时又肯改，仍然是可以进步的。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了。

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

下面讲几个大家在学习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 立场问题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各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首先是把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有些人在陈独秀领导下，立场就很不稳了，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受了当时反动阶级的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所以，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很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既然如此，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例如，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北洋军阀的专横卖国，更使我增加了爱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反对中日军事协定（11）等爱国活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起点。知识分子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危险性。假使从民族立场发展到国家主义（12）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别的国家，对内压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这种危险性虽然有，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所以人们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所以，知识分子初步有了这样的思想，应该受到欢迎。当然，我们也要防止产生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思想。

在中国，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五四运动时的同辈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家知道，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13）分成两派：以李大钊（14）、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产主义；另外，曾琦（15）、

李璜（16）、左舜生（17）等人又是一派，他们走向了国家主义，结果做了国民党的尾巴。这个尾巴做得也很可怜，因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环境里，不可能出现土耳其式的基马尔主义（18）。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极少数人玩弄那种货色，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一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国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19）和孙中山的革命，严复（20）和康有为（21）的改良，在当时都是想把中国往前推进，但结果都失败了。中国既没有像法国大革命（22）那样把封建势力完全摧毁，也没有像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23）。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24）工作时看到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地主和富农在中国农村中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压在农民头上，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过去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统统失败了，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

中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觉醒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先生也提过“以俄为师”的口号。这样，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因为封建经济束缚着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买办势力束缚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买办势力，成为一种反动政治力量，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

人民的立场，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呢？不错，当着对敌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的，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斗争的，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和国民党讲联合，共同对外，这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明确了。你们从胡乔木（25）同志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坚决主张对国民党有联合有斗争，推动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战，这是坚定的人民立场。但是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迁就了国民党，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清楚了。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曾发生过这样的错误。那时联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争不够。后来认识了这个错误。纠正了，到重庆、南京工作时就好一点了。这就是说，人民的立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稳了的。大家看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读了很多书，又住过延安的学校，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讲话中就首先提出立场问题。

现在，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工

人阶级的伟大就在于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服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传过。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因为工人阶级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劳动者，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

对阶级立场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有几种认识。一种认识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产业工人不过三四百万，并且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地带封建的影响，恐怕不会很强，怎么能领导全国呢？另外一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很大的数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阶级立场和思想？是不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种认识是：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后，实行党的口号、政策，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就体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这三种想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但是只要积极工作，发展生产，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会发展壮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从小到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由幼年长大的，幼年的生长力是最强的。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对农民有好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吗？我认为，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工人阶级并不把它的立场私有，只要真正愿意接受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场上来。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不过跟知识分子不同，它经过现代化大生产的锻炼，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立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梁漱溟（26）先生在一封信上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他这活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毛泽东思想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就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

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毛泽东

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常说，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碰过钉子，摔过跤，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最有用处的。所以共产党员也需要经过锻炼，而且是长期的锻炼。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二 态度问题

明确地认识了立场的发展过程，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存在，还有国家的对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要统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中国人民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之苦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侵入朝鲜，侵入我国的台湾。世界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逐步觉醒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两个阵线，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这样的世界形势，我们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这样一个区分，那你是什么态度呢？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当然，在中国还有站在敌人方面的反动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我们要肃清他们。但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能不表明态度吗？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必须要有敌我友的观点。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争取他们。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哪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这样，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这是在国际上。在国内呢？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首先应该巩固工农联盟，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分子。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动阶级，最集中地表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上，还有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税，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也许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临时性的，最后态度总是要判明的。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27）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

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28），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的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

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很同情新中国，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我们绝不勉强。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谅解。

注释：

本题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出版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208—221 页。

1951 年 9 月起，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的教师进行了有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为了统一领导这一运动，教南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是这个学习委员会的分会。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经济学家。1915 至 1948 年先后任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校长。

五四运动，见 107 页《思想改造应先从自身检讨做起》一文注。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 年 11 月被开除出党。

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

家、思想家。早年参加戊戌维新运动，1904年和蔡元培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加入同盟会，开展革命宣传工作。辛亥革命前，他先后在《苏报》、《国粹学报》、《民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公开提出推翻清朝统治，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顾问等职。1924年后逐渐脱离民主革命运动，专门从事讲学。

《国粹学报》是1904年成立的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1905年2月在上海创刊。它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宗旨，是一个既阐发民族学术传统、宣传反清思想但有复古主义倾向的刊物。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投降卖国。1915年5月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12月称帝。1916年3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

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1916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1926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1927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1928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这些条款共有五号，分为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并加以扩大；二、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各种特权；三、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五、聘用日本人为顾问以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允许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各省之间修筑重要铁路，并承认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整顿海口等优先权。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政府对日大的这些要求，除声明第五号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一概加以承认。后来，因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上存在矛盾，日本的这些要求没有全部实现。

（11）指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在北京先后秘密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以“共同防敌”为由，保证日本军队可以在共同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进入中国境内，并支配中国的有关军队。

（12）国家主义是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19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它标榜“国家至上”，主张放弃阶级斗争，效忠于剥削阶级的国家，有些国家主义者还鼓吹“民族优越论”，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对立，并用保卫祖国的名义鼓动侵略战争。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组织了奉行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对共产党相反对苏联的后动。

(13)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建立的一个社团。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1919年7月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个学会兼收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刊物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由于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1925年底停止活动。

(14)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并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1918年参加筹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5)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1918年参加发起筹组少年中国学会。1923年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李璜等建立中国青年党。1924年回国，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1926年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45年任该党主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并任国民党政府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

(16) 李璜，1895年生，四川成都人。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3年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曾琦等建立中国青年党。1926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任该党代理主席。

(17) 左舜生(1893—1969)，湖南长沙人。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党。1926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35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曾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部长。

(18) 基马尔(1881—1938)是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919年起领导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基马尔主义是以基马尔为代表的、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潮。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曾高唱基马尔主义，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19)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1851年，他和杨秀清等领导群众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清朝的封建统治坚持斗争十四年之久。

(20) 严复(1854—1921)，福建闽侯人。曾在英国海军学校留学。1894年中日战争后，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曾译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书。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

(21)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帝国主义打败后，他联合一千三百多个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他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1898年光绪皇帝任用他相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参预政事，试图变法。后来顽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揽政权，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康有为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22) 法国大革命指1789年至1794年在法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次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

（23）明治是日本天皇睦仁的年号。明治维新是从 1868 年起在日本明治年间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虽未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但废除了封建割据的幕府制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发展资本主义，使日本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24）土改，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 1952 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25）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6）梁漱溟，1893 年生，广西桂林人。1941 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委员、秘书长。抗日战争初期，提倡过“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政治主张，宣扬政府不能带有党派色彩，应当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解放战争时期，在国共谈判中，他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调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27）张伯苓（1816—1951），天津人，教育家。1904 年在天津创办敬业中学堂（1901 年改名南开学校）。1919 年任南开大学校长。1945 年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字委员、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

（28）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地质学家。1943 年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不久辞职赴法。1951 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18．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

为什么说黄炎培是进步分子呢？有的人还不大懂。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就是因为他跟资产阶级有来往有交情，能够把他们的话说出来，又能够把我们的话经过他说给资产阶级。当然在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说得不完全，这也不奇怪，他又不是共产党员。在政务会议上，常常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讲出来之后，我们觉得有错的，适当地加以批评。他们能够听取并接受我们的意见，这就是进步分子。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那个会不像我们开会那样，意见都差不多，一个人发言之后，顶多有一点补充。在那样的会议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话，有开明士绅的话，也有小资产阶级的话；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毛泽东同志常常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正是这样一个道理。代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教育和学习。所以说对资产阶级采取敷衍的态度是错误的。

注释：

本题节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出版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的《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题目是选编者加的。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上海川沙人。清末曾考中举人。早年曾加入同盟会。1911 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40 年底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 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日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

这是唐代刊期政治家魏征说过的话，见《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曾多次引用过这句话。

19．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让我来看看你们，我也早想来看看你们了。党和人民政府是很关心你们的。

你们让我讲讲，我的话都讲了，都给你们学生会副主席讲了，主要就是希望你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你们是革命干部子弟，你们的父兄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功劳不能记在你们伪帐上。你们又没有为人民做过事，有什么功？毛主席一向认为干部子弟不应该特殊化，应该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一道在学校里学习。你们的父兄是从劳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是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你们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当然，你们现在的生活待遇还不算特殊，还算艰苦，但比起一般水平来，已经算高了。你们头脑里千万不要滋长特殊化的思想，不要骄傲，要谦虚，要尊敬老师，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现在为人民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多做贡献。如果说要特殊，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

你们听说过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八旗子弟，就是清朝的贵胄子弟。你们会写贵胄的“胄”字吗？就是胃字出头的那个“胄”。这些贵胄的祖先都是清朝立有战功的开国功臣，自小骑马射箭，能征善战，以后带兵灭了明朝，建立起清帝国，可是到了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不骑马，要坐轿，整天提着鸟笼东游西逛，游手好闲，坐吃俸禄，不劳而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成了一群大烟鬼。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他们束手无策，一败涂地，屈膝投降。

当然，你们是无产阶级的后代，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你们的父兄为革命立了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战士，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生的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一代胜过一代。过去因为是战争年代，你们的父母投身于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需要公家照顾你们，现在情况不同了，这种干部子弟性贡的学校是要改变的。当然，这不是你们的事，而是政府的事。不过，也同你们有关，你们应该拥护。

注释：

本题选自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出版的《周恩来教育文选》，第 75—77 页。保留原题目。

八旗，这里指八旗兵、清代常备军之一。它是分别以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军旗为标志的八支军队的统称。每旗七千五百人，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为正副统帅。八旗兵后又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20．既要防止自卑，也要
防止骄傲自满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日)

在学习中，我们还要防止自卑，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那也不应该。我们虽然落后，但也有可以自信的地方。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但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是可以创造出智慧的。劳动产生智慧嘛，我们还是可以赶上去的。当然也不要有一点成就就骄傲。我们是一个大国，由于我们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可以少走苏联的一些弯路，这就可能产生新的骄傲自满。如果现在我们还没骄傲，到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有几千万吨钢了，骄傲的危险就会来了。我们要时常看得远一些。骄傲自满总是危险的。而且我们国家这么大，容易有大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在有的国家工作的同志，就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大国主义的倾向。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不会发生错误，事实上是发生过的。现在，国际活动增加了，人来人往很多，各部门就需要经常地检查这个问题。

注释：

本题节选自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5 月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文选》中的《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题目是选编者加的。

21. 谈谈青年的学习和生活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是学校的青年，所以我特别要向青年讲几句话。

首先要讲的，就是现在的中学生，进学校是为了什么？受过教育以后去做什么？进中学的每个人不可能将来都升人大学做大学生，都当高级知识分子，或者当国家干部。当然，你们里头会有不少人升入大学，成为高级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但更多的人毕业后要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论能不能升学，不论干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你们学习的目的，也是国家办教育的目的。国家办教育，就是为了使青年一代不再是文盲，而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提高，国家才能建设得好，社会主义才能建设得好。一个文化不高的人，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是很困难的，如果是文盲，就更困难了。有了中等的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就比较容易些。所以，工厂里的劳动者也需要受过中等教育。不仅现在还在学校学习的青年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已经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现在许多工人参加业余学校学习，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文化提高到中等的水平。不仅工业有这样的要求，农业也是一样。农民也需要有文化。我国可耕地面积比较少，需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我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就必须提高技术。一系列的技术措施需要有知识的人来掌握。所以，我们青年一代的农民应该有文化。有了文化，不仅今天可以掌握已有的技术，增加生产，而且将来能够运用更新的技术，解决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要懂得劳动的可贵，要热爱劳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旧社会有句老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做官，这种观点是违反时代潮流的，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否定它。我们应该认识到，学习是为了劳动，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联系到就业的问题了。青年人学习告一段落，就要到劳动岗位上去，到农村和城市的各种劳动岗位上去，这就是就业。就业的范围很广，在厂矿企业、学校、机关里工作是就业，在农村的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各种商业机构里工作也是就业。同时，我们应该肯定，从事家务劳动也是劳动。国家给一个人的工资，农业合作社给一个劳动力的工分，都不只是为维持本人的生活，而是包括维持一定数目的家庭人口的生活的。因此，我们的工资或者工分的收入，不仅为了个人，还要负担家庭的生活，要养育儿女，赡养老人。

说到赡养老人，我们有些青年团员也许会问：“难道现在还要我们讲孝道？”对“孝道”要做分析，要辩证地看。当封建社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利用“孝道”压制青年的时候，我们要推翻封建社会，反对“孝道”，甚至要进行家庭革命。几十年前，有人就写过《非孝》的文章。当年有些老先生对那篇文章曾有不少非议。可是当时那篇文章是有道理的。现在就不同了，封建统治已经被推翻了，我们就不能再笼统地说“非孝”了。在旧社会，封建家庭束缚我们，我们要反抗；在新社会，家庭不再束缚我们了，老一代曾经哺育我们成长，我们就应该赡养他们。类似的问题还有。例如，我们在“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完全应该的，孔家店是要打倒的。可是现在对孔夫子就应该全面评价，对他的一些好的地方，就应该给予肯定。又如，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要推翻清朝，要彻底否定它。那时，你们杭州也是一个革命

的地方。现在，徐锡麟、秋瑾的墓在这里，章太炎先生的墓也在这里。我们要纪念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一代推翻了清朝，是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上有份的人。现在我们已经推翻清朝几十年了，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清朝的皇帝及其他历史人物也要作一个公平的评价。我们不是常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吗？对这两条，清朝就有一定的贡献。所以我们现在也要肯定它的好处。那个净慈寺前面康熙、乾隆两个皇帝题的字，还是应该保护，搞干净一些，现在太脏了，我最近去看就看不清楚。康熙皇帝对中国发展的功劳，比乾隆皇帝大得多。你们看，我们把孔夫子，把皇帝的好处都要肯定，何况其他。有否定，有肯定，这就是辩证法。如果我们当年不对封建家庭加以否定，不闹家庭革命，我们今天也就站不到这个地方了。可是革命成功了，现在就应有新的观念，对家庭要有听肯定。国家给了我们工资，我们能够对曾经养育过我们的老人，在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后不去养活他们吗？当然不能。应该由个人负担，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这些都交给国家去管。我们个人拿了工资要负担应该负担的事情。比如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你得的工资就应该有她的一份，因为没有她的劳动，你就难以生活。家庭里养儿育女的事情，也要共同负担。

下面谈谈生活与幸福的问题。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得到幸福。说到幸福，不仅要看到眼前，还要看到长远，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前辈革命的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的就是后代的幸福。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我们现在也应该想一想，怎样为我们的后代谋幸福，为我们民族谋长远的幸福。回想过去，我们是从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中过来的。我们的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不仅是近百年，而且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几千年间，劳动人民不断斗争，形成了一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种传统，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光大。现在屈际形势趋于缓和，我们应该利用这种环境在工作中、劳动中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为了我们人民生活的幸福，为了长远的利益，也为了后代，我向你们建议：最好是晚婚，并且节制生育。现在我国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全国人口每年平均净增百分之二点三到二点五，也就是净增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一年增长的人相当于一个不很小的国家的人口。我们应该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要有一个计划。人不是很聪明吗？我们建设国家，可以搞计划，为什么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人的生育就没有计划呢？在生育方面没有计划是不行的。尤其是青年，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利用大好时光增加知识，学点本事，努力劳动，所以最好是晚婚。今天在座的都是城市青年，大多数是学校的青年，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性。这是讲没有结婚的，至于结了婚的，就应该计划生育，就要节育。我们当前工资收入还比较低，养育很多儿女也是困难的。儿女多了，首先会影响母亲的健康；母亲不健康也养育不好儿女，对儿女的教育也会增加许多困难。从长远看，这对增强人民的体质，提高人民的智慧，都是不利的。我们应该一代比一代更好。

注释：

本题选自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出版的《周恩来教育文选》，第 144—149 页。保留原题目。

徐锡麟（1873—1907），浙江绍兴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1903

年去日本，次年在上海参加光复会，成为该会骨干。1905年在绍兴办大通学堂，以准备革命力量。次年打入清政府内部，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1907年与秋瑾准备在安徽、浙江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在安庆枪杀清巡抚恩铭，散发《光复军告示》，率领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起义失败后被捕，英勇就义。

秋瑾（1875—1907），女，浙江绍兴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1904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反清革命活动。次年在国内扣日本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1906年因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而回国。归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1907年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室，联络与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起义。当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秋瑾也随即被清政府逮捕，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净慈寺 在浙江杭州西南，后倚南屏山，前对雷锋塔，为西湖著名胜地。

康熙 即清朝康熙皇帝玄烨（1654—1722），清世祖第三子，1662至1722年在位。在位期间，曾几次平定少数部落上层人物发动的叛乱，抗击沙俄侵略势力，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有一定贡献。

乾隆 即清乾隆皇帝弘历（1711—1799），清世宗第四子。1736至1795年在位。在位期间，先后讨平西北，西南少数部落上层人物的几次叛乱，拒绝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有一定贡献。

22．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

有的宗教界朋友担心，既然经济基础的改革会影响到思想方面，那么，是否也会影响到宗教呢？经济基础的改革对思想方面有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现在我们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共产党内有很多农民党员，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参加合作社，干得很积极。他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在组织上是按合作社的章程办事，并且许多人是乡政权的干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都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但是，一到了晚上，有的就怕鬼。你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怕鬼，我就不相信。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地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宗教界的朋友们不必担心宗教能不能存在。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

注释：

本题节选自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2 月初版的《周恩来经济文选》中的《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题目是选编著加的。

23．说真话，鼓真劲，
做实事，收实效
(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活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因为有上游，你才争上游。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我们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鼓干劲也要实事求是，有的就是鼓假劲。比如有的提倡苦干几天几夜，过年也不休息。你在那里鼓劲，他就苦战，你走了，劲也没有了，幽照样休息，照样过年。

做实事。做了实事，就有实效，否则强迫命令，就会搞一些不实在的东西。这几年《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如拔白旗等，他们已经做了检讨。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天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你们也都是老革命了，参加革命都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

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战争年代，军队讲民主，就能打胜仗。规模最大的是解放战争，那时军队也最讲民主，仗怎

么打法，作战方案怎么定，允许连队讨论，提出意见。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创造，也是全军的创造。军队能够讲民主，为什么党内不能讲民主呢？我以为要按党章办事。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比如开电话会议，是中央先开的，以后一层一层开下去，电话会议又无法讨论，只能层层下压，这是不对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对党内民主生活都有过说明。乱斗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当然有些是属于违法乱纪性质的，这不只是党内问题了。违犯了国家法律的，要按国法处理。

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注释：

本题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49—352 页。

魏征（580—643），唐初政治家，唐太宗在位时，任谏议大夫和秘书监等职。他敢于直言进谏，说过：“兼听则用，偏信则暗。”

在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过程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1962 年 4 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为在“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

24．历史是发展的，个人
也是发展的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啰嗦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历史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毛主席说他小时候还烧过香。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报信过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时，我们组织了觉悟社。后来有人问邓颖超：那时你们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她回答说：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社员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以后有不少人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

注释：

本题节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出版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的《论知识分子问题》，题目是选编者加的。

无政府主义是 19 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青年中曾有过较大的影响。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最初它们也表现过某些反帝反封建的意愿，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些曾经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青年转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则愈来愈趋于反动。

觉悟社是 1919 年 9 月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进步青年学生团体。成员有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二十余人。主要活动是出版《觉悟》杂志，讨论研究新思潮，抨击孔孟之道，积极领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1920 年冬，觉悟让社员分散各地，社的活动无形停顿。以后，它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是英文“行会”一词的音译），是 20 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潘蒂、柯尔等。他们主张一个社会应设立两个平行的组织，一个是由工人、工程师等按行业联合组成的产业基尔特，领导和管理生产，一个是作为消费者的组织的国家，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消费。他们幻想等到基尔特发展到包括全体人民时，就可以和平地代替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

费边让会主义是以英国费边社的主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

潮。费边社是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884 年创立的团体，以鲁于等待时机、实行拖延经进战术著称的古罗马统帅费边命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维伯夫妇、肖伯纳等。他们以为用温和缓进的办法，通过细小的改良就能使资本主义制度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25．所有的人都要自我改造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一)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改造有性质上和程度上的不同。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改造，是带有强迫性的，这与人民内部通过劳动、生产、学习进行的改造有性质上的不同。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旧东西多的多改，旧东西少的少改，去掉坏的影响。

(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爱祖国，进一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逐步改变旧的立场和思想体系。就是长期在党内锻炼的同志，无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见得那么巩固。

(三)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

(四)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五)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帮助人家，首先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六)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

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现在大家肚里有气，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帮助不够，要把这个扣子解开。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过去科学、文艺工作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希望今后要不断改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注释：

本题节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出版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的《论知识分子问题》，题目是选编者加的。

26．在思维的过程中，经常
有不同的意见产生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

.....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它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不要说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群人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的头脑里，也不能有这样的情况。每天的客观存在，反映到人的头脑里面，在思维的过程中，经常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自己肯定了的東西，后来自己又否定了。这样看对了，那样看又不对了，几个侧面看完全了，才掌握了全面。原来没有认识到的，后来认识到了，以后又有了更加新的认识。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能发展，一个党的政策也才能完备，一个团体的工作也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间得到改进.....

注释：

本题节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的《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题目是编者加的。

27．自己的毛病，不要隐讳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知识分子终归有自己的毛病，都有些尾巴，不要隐讳。我有没有呢？也有。我在广州会议上就说过，我是“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我自己是个革命知识分子，但要把自己的来历讲清楚。我原籍绍兴，就是戏曲中绍兴师爷的那个绍兴，他们长着红鼻子，也是丑得很！家在淮安，因我主在淮安，现在淮安还有一幢房子，当地还让人去参观，这是个负担。我提过几次意见，最好县里收了去。在座有没有淮安县委的同志”请你最好收了去。既然原籍绍兴，家性淮安，跨了两个省，所以是江浙人也。为什么要交代？就是来自那里，要讲清楚，不要怕。“猴子变人”，几万万年了，尾巴没有了，还留着块骨头。坐起来还不那么舒服。我们要知道改造是长期的，不要怕，要欢迎。一方面要团结，一方面要自己努力。共产党员到死还要改造。在座的有许多领导同志，要好好团结知识分子。人有点知识，就会不自觉地骄傲起来，你们不要怕他们骄傲。

注释：

本题节选自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 月出版的《周恩来经济文选》中的《要重视技术力量》，题目是选编者加的。

见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86 页）。

28．中国人办外事的
一些哲学思想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

(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主席阁下同我讲过，埃叙合并为阿联，当时是有错误的，后来又分裂了。现在再搞统一，已经接受了过去的教训。这说明，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纳赛尔总统在埃叙分裂时采取的态度，我们很欣赏，表明纳赛尔总统吸取了经验。

(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

(三)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

(四)“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欺，应该谨慎；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其实，我们早已用这种做法来对付美国了，例如抗美援朝。当时，我们发专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去年轮到印度身上，它却忘记了这条经验，竟也以为我们的忍让是软弱可欺。我可以告诉阁下，只要印度不挑衅，我们决不主动出击，即使印度挑衅，我们也一定像我致班达拉奈克夫人信中提到的那样，在行使我们自卫权利以前，先通知他们。

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注释：

本题选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27—328页。

阿联，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年由埃及同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叙利亚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71年阿联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抗美援朝，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9月15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1953年7月

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指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中，针对美国在朝鲜进行的侵略战争所讲的一段话。见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一文。

1950年10月10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英、澳等国授权美国侵略整个朝鲜的提案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军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再次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及其帮凶国家侵略朝鲜的严重状态和扩大战争的危险趋势不能置之不理。侵略者要对他们疯狂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

指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就朝鲜局势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并请大使将此话报告印度政府总理，向美国提出警告。

1959年8月，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的朗久而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境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至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建立军事据点，不断进行军事挑衅。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建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均遭拒绝。同年10月，印军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实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入侵。为了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政府还主动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人员，交还战斗中缴获的武器。到1963年2月，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后撤计划。

班夫人指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1916年生。当时任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1963年1月19日，周恩来总理复信班达拉奈克夫人，同意地在适当的时候公布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以科伦坡会议建议作为中印官员会晤的初步基础，并衷心希望他们的努力将能导致中印双方就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开始直接谈判。

指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而举行科伦坡会议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柬埔寨、缅甸、埃及、印度尼西亚、加纳等亚非六国。

29．反对官僚主义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

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当然，不单单是这七种，但这七种特别突出。

官僚主义有各种表现，我现在把它分开来说。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执行的业务部门给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所以我把这种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时时警惕的。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这种人大概总是不去抓业务，觉得我是领导政治的，人家的话听不进去，觉得琐碎，也不研究人家讲话的内容，结果就蛮横专断，瞎乱指挥。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常有人说：“我做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好像这种官僚主义还能容许似的。我看，这种官僚主义也要批判。如果是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领导干部，怎么能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矮，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

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为规律了。那里的领导人即使精明强干，也会有官僚主义。因为那个机关本来不需要那么大，机构搞得那么臃肿，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办事情，吵吵嚷嚷，很多事情在那里兜圈子，办不出去。把机关搞小，有事情一商量就解决了。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新；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比的官僚主义。

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不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严重得很了。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了。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我举了这么多种官僚主义，分析不一定很科学，也不是说在一个机关中所有各种官僚主义都已经发生。但是，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在我们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严重的虽然是少数。然而，正如党中央三月一日的指示上所说：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注释：

本题选自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18—422 页。

指 1963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30．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气，
经常地向三个方面学习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气，要经常地向三个方面学习：

一是要向群众学习。毛主席讲，群众是智慧的源泉，所以，我们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每个同学到任何一个岗位工作，都要有这种精神，不要觉得自己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已经够用了，去了就教训别人，那就要犯错误。我们要注意向同事学习。作教员的要向其他教员学习，作技术工作的要向其他技术人员学习，互相切磋。要向先参加工作的人学习，因为他们参加工作早，对这部分工作已经有经验了。

二是要向书本学习。只是向群众、向同事学习还不够，还要向书本学习。例如，在政治理论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文献、毛主席著作。其他方面，如自然科学、历史知识等等，也要学习。书本上有些东西是对的，有些东西是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也要了解。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知识丰富起来。

三是要在实际斗争中学习。这包括在生产实践中学习，在革命斗争中学习，在科学实验中学习，从而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注释：

本题节选自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出版的《周恩来教育文选》中的《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题目是选编者加的。

31．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
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

格伦·科恩（以下简称科）：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向，总理对目前在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我很想了解这些。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的粗浅的、表面的观察。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别的国家的青年来访问时，我们发现他们不一定和你们同一派，但是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形式，比如留长头发，等等。我碰到过英国青年也有留长发的，碰到这日本青年也有这样情况的。

科：对，总理先生。这些表现形式是许多日子思索的结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可能有少数人熟悉。

周：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我只能回答这些了。

科：同意。

周：补充一句话，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这是我们的认识。做为朋友，我们所以有这个建议。

注释：

本题节选自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5 月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文选》中的《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谈话》，题目是选编者加的。

格伦·科恩，美国圣莫尼卡市立学院学生，男子乒乓球运动员，当时是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代表团成员。语录选抄

语录选抄

周恩来人生箴言

—

譬之以人，生而哺乳，幼稚成行，其父母家族重视之者，莫不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智识之启发尚次之。逮及十余龄，则入学术识是大问题，而身体性情则随前者以进。所谓根基固于先，智识诱于后，未有不克立而为人者也。

《本社之责任观》（续）（1917年5月）
天津南开学校校刊《校风》第65期。

今日之学生，未来社会中心之人物也。人非鹿豕，秉灵以生，处事接物鲜无评判之力。今日能观察校事，他日即可洞知世情。其懵然于今日，未有他日能号为明达，而他日之明达，亦未有由今日冥顽不灵产出者也。然而学生中固大多数主缄默者，岂均懵然邪？曰：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西人主动，吾人主静。西人主合群，吾人主个人。今世界潮流所及，忧国者怵于大势，群以合群主动号于众，奈之何，吾党青年，犹复以独善其身，自鸣清高，以自斩其生机哉！

《本社之责任观》（续）（1917年5月）天
津南开学校校刊《校风》第65期。

青年人可以在最少消耗的情况下成就最大的事情，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在生产上、学习上及各种工作上。他们还可以创造发明，因为青年人富有朝气，可以抓住很小的事情加以研究，能够接受新鲜事物。这些都是青年的优点，今后要发扬起来。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
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8页。

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

《“觉悟”的宣言》（1919年12月29日）
），《觉悟》第2页。

我们过去在广州搞革命时，少年气盛，有点“乱指挥”，这种不好的传统不要学。

《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20页。

青年人的成长是老一辈亲手培养的，这一点要很好地向青年人讲清楚。从老知识分子身上找毛病是很容易的，但要看主导方面，要看到各有所长。比如我讲话可能不如青年人讲得流利，但是谈问题、论经验则比他们深些。如果说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

《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17页。

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中国这句古话很有道理。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到老。学然后知不足,越学就越感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知道的东西太少了。

《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16页。

外语教学有个基本功问题。比如京戏有基本功,唱腔、道白、武打等,这都是京戏艺术的基本功。而且,京戏的基本功不限于京戏艺术本身,还有政治、历史、地理等知识。学外语也是如此,不光是要掌握外语的语言、词汇、语法,做好听、说、读、写、译五个字,还要懂得历史、地理。不仅要读中国地理、历史,还要读世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

《关于外语教学的谈话》(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32页。

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在文艺工作座议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3—344页。

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

《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41页。

二

能否认真坚决地执行婚姻法;能否采取严肃慎重负责的态度解决婚姻案件,保护妇女的合法利益;能否积极支持群众特别是被压迫的妇女群众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反对封建思想的正义斗争;能否在处理自己本身的婚姻问题时以身作则地遵守婚姻法——这些,都是自己在政治上是否愿意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严重考验,也是能否严格地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严重考验。

《切实执行婚姻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1951年9月26日),《周恩来选集》

下卷第 57 页。

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参加家务劳动也是光荣的。

《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
(1957 年 9 月 26 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第 381 页。

训练大批知识分子，学习本事，这点对女同志特别重要。因为妇女解放跟政治斗争离不开。现在政治上胜利了，政治胜利与经济胜利是离不开的。战争胜利，土地改革，使妇女得到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但是我们必须使每一个妇女在农村有土地，在城市有职业、有技能，这是解放的关键。

《关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问题》(1950 年 9 月 14 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 62 页。

一切革命工作者，尤其是妇女工作者，只有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意志。我们既然知道国家有困难，就要分担，使我们每个人在困难中生长出力量，帮助国家克服困难，这就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力量。我们妇女同志应该分担国家的困难，敢于克服困难，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关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问题》(1950 年 9 月 14 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 65—66 页。

要实行晚婚、节育的政策及其有效的措施。计划生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提倡晚婚，一方面是提倡节育。不论是劳动或者学习，青年都正是有为的时候，精力也旺，把精力用在劳动上、技术上、学习上、发明上，是会有很大的创造的。人的精力最饱满的时候，是二十至三十岁这个脑筋发展最快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把最大的精力放在这些方面，不论对劳动，还是对学习、工作，都有好处。提倡晚婚，对于我们培养共产主义风气也是有好处的。当然，这跟文化有联系。结婚以后要节育，也就是计划生育。

《应该确立社会主义人口论的正确观点》(1963 年 7 月 8 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 510 页。

三

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方面都受了影响。但是一般他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956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教育文选》第 124 页。

知识分子应该加强团结，养成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新风气，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应该尊重年长的、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并且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知识分子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1962年3月27日），《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03页。

在知识分子内，也和党内一样有左、中、右。任何党派、社会团体内都有左、中、右，这是规律，是客观存在。左、中、右或者说进步、中间、保守，他们之间也会相互转化，保守可以转向进步、中间，中间、进步也会变成保守。但是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去排队就不好了。人的思想状态是会变化的，政治思想、主张经常有变化，特别是对科学上生产上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

《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3页。

我们讲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实践，是说每个人不可能懂得所有的事情，因此要尊重科学人才，请他们办某些专门的事情。

《要重视技术力量》（1962年12月24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01页。

依我看，一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认识。他们在事业上下功夫、费精神，目的是为人类扫除生存中的障碍，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发展精神生活。……我相信绝大多数科学家，从他们本身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来说，都是为着造福于人类的。

《建设与团结》（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0—41页。

在科学研究中，要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以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19页。

在新社会，社会制度有了根本变化，生产力解放了，人们思想解放了，单枪匹马变为群策群力，科学家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大的自由天地。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另外，把集体需要与个人自由辩证地结合起来，也需要有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

《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05页。

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

服务，虽然政治上学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读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2—343页。

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经验和才能，必须有很好的修养，其中包括训练，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不能成为评论家。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2页。

你们是“灵魂工程师”，思想总要高些。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否则思想如何表现出来呢？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传工作，不能成为艺术家。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1—342页。

我们文艺队伍中的每个同志，不仅要做一个有阶级觉悟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还要把自己训练成为有文化水平的、有健全体质的文艺劳动者。……所谓健全的体质，更正确地说是一个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的体质。所谓文化水平，也不是只有本行的知识，还要有其他文化知识、科学知识、艺术修养来丰富自己。有了这样的知识，你的体质也会健全，情操、作风就会高尚起来。

《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1963年8月16日），《周恩来论文艺》第187页。

演员的才能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们的演员很少全才。特别是年轻的演员，更要努力学习。文艺修养是多方面的，文学、音乐、美术等等，都需要懂一点。

《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59年5月3日），《周恩来论文艺》第71页。

文艺修养和一个人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是很有关系的。例如，前几年加入我们共产党队伍的梅兰芳、程砚秋两位同志，在戏曲演唱上都独树一帜。他们的个人品质、民族气节很好，他们的艺术不庸俗，没有低级趣味，这和他们两位的文艺修养很有关系。

《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20页。

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19日），《周恩来进集》下卷第347页。

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7页。

四

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年3月6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7页。

《第二个春天》中批判的那个青年只讲个人兴趣，而雷锋是贫苦的孩子，是革命胜利后才获得幸福生活的，他就全心全意为革命。……雷锋日记反映了全心全意为集体的思想，是一部很好的日记体文学。过生活关就是要全心全意为集体，要求我们先公后私，有时公而忘私。

《在文艺工作者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
（1963年2月8日），《周恩来论文艺》第147页。

大革命时期，广州起义中的赤卫队总司令周文雍，认识了一个女同志陈铁军，两人有了爱情，因为革命工作忙，不能很快结合。广州起义失败后，来不及撤退，两人被捕了，在国民党法庭上被判死刑。两人在堂上觉得总算恋爱了一场，周文雍把围巾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围到陈铁军的脖子上，亲了她一下，就双双走向刑场，同赴死难。……正是因为他视死如归，所以他的爱情才是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革命者是有人情的，是革命的人情。

《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论文艺》第117页。

现实中的先进人物是最平凡最普通的，现实中没有神化人物。把先进人物神化了，先进人物就没有发展了，……先进人物所以先进，是因为他不断

实践，不断总结经验。

《看《豹子湾战斗》后的谈话》
(1964年5月31日)，《周恩来论文艺》第191页。

共产党员要争取自己到老到死永远是共产主义战士。……这是长期奋斗的目标，是没有止境的。

《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1963年4月19日)，《周恩来论文艺》第156页。

一个革命者不仅要把旧社会破坏，而且要热情地建设新的社会。

《关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问题》(1950年9月14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7页。

作为一个党员、革命干部、共产主义战士，要承认两条：一、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穷的。学到老，学不完，直到心脏跳动停止，你还学不完；二、社会总是在过渡中，我们把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把剥削社会过渡到无剥削社会，因此，人也永远要处在改造中。

《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
《周恩来论文艺》第110页。

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思想，不可能自发生长出来，必须经过长期的自觉锻炼。

《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1963年4月10日)，《周恩来论文艺》第156页。

比如，去年大水，各处反映都是这样：不管哪级干部，包括当县长的，当专员的，或者是中共的县委书记，都是亲身参加抢险、防洪、踏水车泄水、筑堤，甚至被淹死。凡有困难的时候，干部都是当先，这是革命的好传统。所以，人民称赞，人民感觉我们的干部是可爱的。

《节约和改善生活》(1955年2月3日)，
《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19页。

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要反对特殊化作风，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树立新风气。

《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1962年2月7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55页。

就拿我说，你要有一两年不到底下去，就会和群众有隔阂，许多群众的事情就会不晓得了。

《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座谈会

上的讲话》（1964年6月23日），
《周恩来论文艺》第203页。

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习惯势力在中国很多，如农村中急起来打人，就是一种习惯势力。这是从旧社会带来的，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群众。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
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3—334页。

党员应该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能自视过高，居于领导地位。

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
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
《周恩来论文艺》第109页。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和防止做官当老爷的倾向，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普通劳动者，与群众同甘苦、共呼吸，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

《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21日），
《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文件》第29页。

不管党同、团员或非党团员，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集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地位多高，责任多大，都要在集体中受到监督，都要有人管。这是集体生活中的一条原则。

《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
劳动者》（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
教育文选》第216页。

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
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1956年9
月16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4页。

五

我们不论新的、旧的、年老的、年轻的，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洪炉中，都要不断地改造。如果生命还在，总是要不断地去掉旧的思想意识，不断地前进。同时，只要我们分清了敌我界限，我们大家都在一条战线上，我们就应该在改造中团结，也就是从思想斗争中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一道改造。

《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
(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论文艺》
第56页。

每个人都要改造，旧社会来的人要改造，新社会长大的也要改造，因为社会里仍存在旧的东西，如果自己不坚定，没有防疫力量，就仍会受到旧思想的传染和影响，所以也要改造。

《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1963年4月19日)，《周恩来论文艺》第153页。

我们的思想甚至还有封建的思想，我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改造，去肃清这种存在我们脑子里的封建残余。这种改造，需要较长的时间，不要求急，不过你们可以多努力一些。

《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闭幕典礼上的讲话》(1952年11月
14日)，《周恩来论文艺》第45页。

任何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今天也有局限性。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被后人看来也会是很可笑的。

《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
《周恩来论文艺》第106页。

任何人都有局限性，都不那么完全。没有绝对正确的人。……一个人总有长处和短处。事物本身总有长处和短处。说一切都好，世界上没有这种人。不承认英雄有缺点，这是不合乎毛主席思想，不合乎辩证法的。说一切都正确，那就要骄傲，就会垮台。事物没有矛盾，就不能前进。人类没有矛盾，人类就消灭了。世界没有矛盾，世界就毁灭了。

《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论文艺》第116页。

广义地说，我们个人的改造也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我们不可能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共产党员也不是一进共产党就什么都懂得了，要经过多次的学习和斗争，在实践中反复教育自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63年7月22日)，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13页。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要怕听改造这两个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

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我常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还要改造，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论文艺》第89—90页。

思想改造首先是自我批评，第二是互相批评，只有自我批评没有互相批评也是不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思想改造的最好方式。

《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58页。

总之，党员要承认我们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知识还有限。我们的确是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无止境。有这样的精神，才能进步。我们难道部改造好了吗？不可能的，总有些渣滓，总有点需要改造的，有自觉我们才能进步。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94页。

改造客观世界，首先要改造主观世界。要丢掉幻想，确定人定胜天的认识和信心，精神面貌才能一新。

《抗旱防涝，争取丰收》（1966年2月1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77页。

年轻的知识分子也有经常进行自我改造的任务，他们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应当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的同时，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群众的生产和斗争的实践，参加体力劳动，任政治思想上和在工作中产格地要求自己。

《我们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1959年4月18日），《周恩来论文艺》第68页。

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尤其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论文艺》第87页。

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进行这项工作要和风细雨。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论文艺》第90页。

六

如不注意克服错误思想，必然会贻害将来。

《关于文教工作计划问题的指示》（1960年11月14日），《周恩来论文艺》第76页。

山头主义是自立山头，搞独立王国，不许别人碰，不愿同别人合作，不是集体主义的，那种搞法绝对不许可。

《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1963年4月19日），《周恩来论文艺》第174页。

一切破坏经济纪律、劳动纪律、财政纪律和损害公共财产、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在我们这里都是不能容许的；一切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因为这些都损害我们国家的生产发展，因而也就损害我们将来的幸福。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01—202页。

提倡集体主义会不会忽视个人的作用呢？不会的。因为整个社会是积个人而成的。集体主义正是要充分发挥个人作用的，不过我们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14页。

一个人一点不想个人的问题是不大可能的；要求一点不想，也是不现实的。但是，经过考虑之后，想到国家的要求、党的号召，就能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这样，矛盾就好解决了。

《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15页。

不要急，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急躁冒进，也不要右倾保守；要逐步实现，不要求之一步登天。

《关于体制问题》（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72页。

大家都要为国家利益着想，不能只考虑自己那一部分。在一个局部看来是很好的事，但整体看就可能有问题。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衬；果子虽好，没有树和叶，果子也结不成了。

《尖端工程必须列入国家计划，带动其他

工业发展》（1971年9月9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31页。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1956年2月8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1页。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5页。

当然不能说在工作中就毫无错误，但是我们不要怕，要在工作中好好学习。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的政策，所以，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畏惧的态度，不要采取草率的态度，也不要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是应该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1952年6月19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3页。

在科学问题上，共产党应该服从真理。共产党不服从真理，那就不是共产党。如果共产党不服从真理，共产党会被推翻的。要有这个勇气和信心，对于凡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就承认是错误，这就解决问题了。如果李森科不对，批评他的人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要把我们共产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你的道理站不住，你就要修正它。一定要懂得我们是常常会犯错误的，我们的长处就是能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敢于承认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不断地改进。

《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1页。

对我们的成绩与缺点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应该肯定成绩，批评缺点。肯定成绩是为了不使我们失去信心；批评缺点是为了不使我们骄傲。

《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论文艺》第52页。</PGN0163.TX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成了名剧。这是他自己用错了人，他也有责任。但为了军纪，不得不杀他。

《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

《周恩来论文艺》第 117 页。

项羽不听人家的话，只好别姬。李世民善于听反面意见，他看到魏征一来，就如坐针毡，但听了他的意见，好像吃了一剂药。不要不听反面意见。

《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 年 2 月 17 日），
《周恩来论文艺》第 115—116 页。

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老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 6 月 19 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46 页。

我们不怕揭露，即使揭露错了一点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1956 年 7 月 21 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08 页。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我还要说一句，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 6 月 19 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45 页。

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主义者，应该讲老实话。

《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63 年 7 月 22 日），《周恩来教育文选》第 211 页。

我们有时话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的。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人家就不能活了。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 6 月 19 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4 页。

在思想斗争中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各地必须注意纠正。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26页。

七

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自然界中未被认识的事物多过人们已经认识了。

《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4页。</PGN0166.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内掌握得比较全面、比较成熟的东西，能够做结论的先做，其他未被认识的或未掌握好的，经验不成熟的，可以等一等，可以推迟一些时间解决。推迟是为了更慎重，更多地吸收各方面的意见，……

《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4页。

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同时，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没有理论指导而盲目乱撞，虽然也会在失败中摸索出一些道理，但太痛苦了。

《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8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页。

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要破也要立。不要急躁，慢一点做结论。这是不是调和意见呢？当然不是。而是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不断前进。

《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5页。

科学就要有数据。必须从多方面来研究，不能由一方面包了。任何事情不能一个人垄断，学术不能一个人垄断，专家也不能垄断。要同群众结合，吸收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不过他们的分析方法不大完整。专家的作用就是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加工、提高成为一门学问，再到群众中去进行考证，对的肯定，不对的修正，不断地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反复不断地提高。

《加强地震科学研究》（1966年5月28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03—604页。

敢想、敢说、敢干，是指我们要有这种创造精神，但是我们也要有科学的根据，这就需要知识。不尊重科学，就会瞎指挥。

《要重视技术力量》（1962年12月24日），
《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00页。

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应当加以肯定。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5—346页。

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62页。

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把方便让给人家，困难留给自己；要一心一德，同甘共苦。毛主席在七大就语重心长地提出要大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几年，我们有些不够谦虚，也不那么谨慎，讲工作常常只讲成绩，不大讲缺点了。

《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1962年2月7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55页。

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

《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57页。

过去我们打仗，大家都懂得，开始就是一冲。毛主席说：一冲不行，要有两冲。既要勇敢又要智慧，这样，才能打胜仗。我们解放军不仅要勇敢，而且要在勇敢基础上发挥智慧。做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群众工作也是一样。热情可嘉是参加革命的基础，但是当了干部就要用脑筋，用智慧，这样才能领导工作。我们在建设工作中也是一样，可是我们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

《关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问题》（1950年9月14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8页。

搞事业要有决心，要有毅力，像陈总的名字一样，陈总名毅，字仲宏。要有宏大的毅力，持之以恒。

《看 豹子湾战斗 后的谈话》
(1964年5月31日)，《周恩来论文艺》第190页。<

做工作总要碰破多少次头的，我现在可以说是过来人了。当然有的同志还年轻，非碰几次是不能改的。

《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的讲话》(1952年11月14日)，《周恩来论文艺》第42页。

斗争中，有的时候会胜利，有的时候会挫折失利，这就要有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要经得起各种考验，一时受委屈也不要紧。

《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1963年4月19日)，《周恩来论文艺》第155页。

不要怕走弯路，总要走一些弯路才能取得经验。但是，……要力争少走些弯路，多交流经验，互相提醒，互相学习……

《改造北方农业的落后面貌》(1966年3月5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92页。

尽管我们有这么多的困难，可是我们的志气不衰。……我们虽然一穷二白，但是人穷志不穷，……。

《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1962年2月7日)，《周恩来的经济文选》第451—452页。</PGN

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

《认清形势、掌握主动》(1962年5月11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84页。

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人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更可以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当前建设中的几项任务》(1961年4月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29页。

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我们是有充分的信心来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01页。

只要奋斗，就有出路；不奋斗，就无法生存。在我们的新社会，只要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奋斗，是会产生成果的。决定性条件是自己奋斗。当然，基本的大前提是现在社会变了，但主要还得靠自己努力。

《关于昆曲 十五贯 的两次讲话》（1956年5月17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4页。

要面向劳苦大众，我们的下一代，总是要把自己摆在劳苦大众一起，要能够吃得起苦。因为我们的革命精神，就是从吃苦中得来的！不吃苦怎么能革命呢？不吃苦怎么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呢？

《应该确立社会主义人口论的正确观点》（1963年7月8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15页。

应该想到“常将有日思无日”这句古话，现在有，要想到没有的时候，多节约一点就好。

《当前建设中的几项任务》（1961年4月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30页。

要使我们的干部和人民都要有这样一个观念，节约一点，就是对于国家建设增加一分，对于国防力量增强一分；浪费一点，就是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害。

《节约和改善生活》（1955年2月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07页。

九

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但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的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有些制约的办法也还有可取之处。

《关于昆曲 十五贯 的两次讲话》（1956年5月17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8页。

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

《关于昆曲 十五贯 的两次讲话》（1956年5月17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7页。

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

《不要因人废文》（1970年9月17日），

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

《讲历史，多出书》（1971 年 4 月 12 日），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 234 页。

我们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 6 月 19 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43 页。

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不仅要使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最后还要使民族之间的差别消失。到了那个时候，人类主要是对自然界斗争，同时人类本身仍然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集体与个人的矛盾。矛盾的斗争和统一，仍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

《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1963 年 4 月 19 日），《周恩来论文艺》第 153 页。

世界上有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不管是哪种人，相互间都应该是平等的。但现在还有差别，还存在着种族歧视。

《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1961 年 6 月 10 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16 页。

很多民族财富要好好发掘、继承，不能埋没。只要大体好，有些缺点也无妨。

《关于昆曲 十五贯 的两次讲话》
（1956 年 5 月 17 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96—197 页。

一个民族和国家，其所以能够存在，总有它一些长处。尽管以往的社会制度一再改变，但人民是永生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民总是有自己的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东西，但要防止盲目性。只有学到了家，才能说是吸收。

《关于昆曲 十五贯 的两次讲话》
（1956 年 5 月 17 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97 页。

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1957 年 8 月 4 日），《周恩来选
集》下卷

附录

周恩来人生九题

赵春生

探索人生是人类的天性。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有一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二千三百年后的一代伟人周恩来，也讲过类似的一句话：“一个人对世界万事万物，对于人生各种问题，要想看得透，就得志于学，勤于问，敢于闯。”（周恩来同黄埔学校学员曹渊的谈话）所不同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屈原最终是留下无限的惆怅与遗憾，怀沙汨罗，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探索之路；而周恩来却在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凭着自己的顽强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终于达到了他人生的最完美的尽头。

周恩来对人生道路的探索始于学生时代，凡六十年，从未间断。他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西方的进化论观点出发，从对人的本质和社会规律的探索，直到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和成熟，直至完美人格的形成，走过了漫长的求索道路，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对人生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言行一致，知行统一。他是伟大的时代造就的一位举世公认的人生楷模。他的言行曾经启迪和教育过整整的一代人，他的言行必将还会影响和感化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由此看来，我们追寻周恩来光采照人的人生足迹，咀嚼他那博大精深的人生哲理，便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了。

婴儿幼年时期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

婴儿幼年时期是人生旅途的第一站。周恩来提出，人生这一时期应“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的观点，这是基于他对婴儿幼年时期生理与心理特点的深刻认识。

他说，“譬之以人，生而哺乳，幼稚成行，其父母家族重视之者，莫不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智识之启发尚次之”（《本社之责任观》）。这说明，对婴幼儿的哺育培养，首先有一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很显然，不重视，不负责任，是不对的。周恩来是赞誉“重视之者”的。其次还有个方法问题。即“发达身体”、“陶养性情”、“智识之启发”，何者为先，何者次之的问题。仅以现实而论，不少家庭往往视婴幼儿的身体发育为“第一要务”，千方百计补充营养，什么“好”吃什么，什么“新”吃什么，什么“贵”吃什么，但并不懂得儿童营养科学。结果使得婴幼儿或发育过早过快，或一个个成了小胖墩、嫩豆芽，身体并不强健。有的则特重“智识启发”，胎儿刚刚形成胎教便开始了，继而，教说话、教识数、教诗词，再大些则又是请家教，又是入特长班，教师留作业，家长加作业，结果超强度超负荷的学习任务，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小小年纪便失去了天真与童趣，厌学、暴躁，习惯不好……。实践证明，这些做法都是失败的，是不足取的。

周恩来说“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智识之启发尚次之”，细细琢磨这句话包含着几层意思：第一，“发达身体”、“陶养性情”和“智

识之启发”三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第二，三者又不是等量齐观平起平坐的，而是有主有从的；第三，在婴幼儿时期，“发达身体”与“陶养性情”并重，而且应放在首要的地位；第四，“智识之启发”并不是不需要，但在婴幼儿时期只能放在“尚次之”的地位。

“发达身体”为“第一要务”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婴幼儿是人的一生中身体发育的基础阶段，又是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那么，“陶养性情”为什么也必须同时放在“第一要务”的位置呢？

周恩来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同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16年11月29日，他在《试论奢靡二说》一文中就说过：“人性本善，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这样一句话。这是说，人的性情最初本是纯净无邪的，因为在它还没有受到任何外界影响时，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的。但是，以后如果接受了好的影响和教育，他的性情就会变好；反之，则会逐渐变坏。这说明人在最初阶段接受什么样的影响和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后来又提出了“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重要观点。了解周恩来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是以科学事实为依据的，也是他本人的经验之谈。

周恩来不满一岁便被过继给重病的小叔父“充喜”，因此，他的婴幼儿时代是在两位母亲的哺育和教养下成长的。他的生母万氏是位精明能干性格爽朗的家庭主妇，把一个大家庭操持得井井有条。而且还是位善调家讼的能手，每次家族成员发生争执，都请她出面调解。她总是先仔细听完各方的全部申诉后再做理论，由于她能以理服人，往往片言折狱，所以再难的矛盾到她手里也会迎刃而解。他的嗣母（即婢娘）陈氏是个很温柔很有教养的女性，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有一定的造诣。周恩来过继不到二个月，她便守寡了。她当时只有22岁，孤雌寡鹤万念俱焚，惟有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和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周恩来的身上：为他请乳母进行精心哺育，从四岁开始又亲自教他识字，读书，学诗词，学作人；五岁时送他进私塾，六岁进家馆读书习礼。嗣母对他既严教又疼爱，使他受益非浅。周恩来多次回忆两位母亲对他的教育和影响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指嗣母）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周恩来传》）“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同前）他还曾谈到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自己性格另一面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启发，父母是人生的启蒙教师，对塑造儿童心灵与品格的作用非同小可，绝不能低估。为了给孩子以良好的影响与教育，为人父母者必须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慎之又慎！

周恩来对环境给予儿童心理和性情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视的。他九岁、十岁的时候生母和嗣母相继过世，家庭经济也日见拮据，生活的重担又过早地压在他身上……周恩来回忆如此家境对他的影响时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周恩来年谱》）正因为如此，他后来多次谈到孩子的生活条件太优越太特殊了并不好，应该让孩子从小就得到一定的摔打与锻炼。

两位母亲特别是嗣母陈氏对他的要求既很严格又很耐心，从不喝斥打骂，这对周恩来人生观的形成也是极有影响的。因此，他一向主张对婴幼儿性格的陶养不仅要高度重视，而且要正面教育。主张耐心引导，反对打骂体

罚；但他并不反对批评教育。他说“对孩子需要批评教育，但是不能打骂，否则就把孩子打坏了，骂傻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事实证明，溺爱会娇惯坏孩子，打骂体罚也会管坏孩子。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许多看法和主张，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学生少年时期入学 求识是大问题

学生少年时期，是奠定人生基础的重要时期，周恩来主张这一时期入学求识是儿童少年们的大问题。1917年5月他在《本社之责任观》一文中写道：“逮及十余龄，则入学求识是大问题，而身体性情则随前者以进”。他的这一主张既全面又深刻，可以说已准确地把握了学生少年时代的本质特征及重要使命。

研究这一时期周恩来的有关著述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提出这一主张是有充分考虑的。首先，他认为现在的学生少年，就是未来国家的栋梁。早在1912年他写的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就提出了“吾全校之诸同学”，“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的观点。1917年5月的那篇文章也提出了“今日之学生，未来社会中心之人物也”的看法。在1912年10月的作文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的“伟大人物”，也将由现在的学生少年中诞生的见解，充分反映了少年周恩来的雄心壮志。其次，他认为小学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1957年6月6日他在同日本医学代表团谈话时说：“普及教育的基础是小学”。其实早在1912年10月的作文中，他就已经具体地提到“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的观点。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小学这个时期的教育都是极为重要和不容忽视的。正是基于上述的种种考虑，周恩来才确立了学生少年时期“入学求识是大问题”的观点。

“入学术识是大问题”这句话告诉我们，学生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就是求识。同婴儿幼年时期相比，此时“智识之启发”已由“尚次之”的地位上升到了“第一要务”的位置了。因此，就要求学生必须通过各门课程的教学，“有系统地一步步地掌握文化知识和现代科学成就”。（《我们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他特别提醒学生要注意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扩大知识面”。（《努力学习，又红又专》）他认为要“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就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因为，“一个文化不高的人，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是很困难的”。（《谈谈青年的学习和生活》）

为解决好“入学求识”这个大问题，周恩来首先要求校长必须“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司教育之诸公”，“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其次要求学生必须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一是要“博学”、“好问”，他说“一物不知，学者之耻”，“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同上）二是要“慎思明辨”，因为学而不思，人云亦云，良莠不分，正误不辨，囫囵吞枣地学习，是绝对得不到真正的知识的。周恩来少年时代，正是按照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勤奋好学，刻苦读书，“博学”，“好问”，“慎思而明辨”的。因而，他在同学当中

是出类拔萃的。他在奉天东关第二模范小学读书时，十门功课门门都很好。由于他读书多，知识面宽，又能融会贯通，所以他的国文成绩尤为突出。他的作文更是非同凡响，教师经常写上：“气盛言宜，文情斐叠”。“茹古涵今，才思骏发。越后必将高人一筹，诚杰构也。”“笔酣墨饱，气势汪洋，青年有此文字，后日不可限量矣！”“气充词沛，畅所欲言。苟非养到功深，万难至此也。”等一类的评语。他的作文还常常被教师批上“传观”二字作为范文在学校展出。由于他品学兼优，所以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一位教师曾经这样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周恩来传》）

除了求识之外，周恩来同时还提出了“身体性情则随前者以进”的主张。他十分重视学生少年的身体发育和健康，他说“身体是我们学习和工作的物质基础”，“身体不好就不能担负繁重的任务”。（《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为此，他除了要求学生重视和加强身体锻炼，还特别提到要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和社会工作的负担，以保证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他还多次提出要在中小学开设生理卫生课、对女学生进行经期常识教育等。

周恩来从小就很重视身体锻炼。他在东北读书时，身体本来是虚弱的，而且从温暖潮湿的江南来到寒冷干燥的东北身体又很不适应。但是他从不向困难低头，有意识地磨练自己，一年到头从不间断各种体育锻炼。几年后，他的身体便锻炼得十分强健了。同过去比，他完全变了一个样。对此，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重的工作。”（《周恩来传》）

同样，他对“陶养性情”也是高度重视的。他强调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动力，明确为什么而学。他鄙视种种为个人目的而学的动机。“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而读书，就是他少年时代的伟大抱负。这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豪言壮语，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奋发向上！此外，他还十分强调要“注重道德教育”，一向强调学生少年从小就应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作风，特别是要“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要热爱劳动”等。（《给天津市第十五中学的信》）

总之，要求学生少年“受完全教育”，“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就是周恩来的中心思想。

学生青年时期应该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学生青年时期是人生旅途中极为关键的时期。周恩来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学生青年时代，还是在他以后的长期革命生涯中，都对学生青年问题十分关注。他热爱青年，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对青年一代寄以殷切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尽管他日理万机，但仍时时关怀着青年一代的成长。他总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触学生青年。他曾多次出席青年的全国性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也曾多次出席首都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应届毕业生大会并作专题报告；还多次到一些高等院校和中学视察，演讲。可以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周恩来是接触学生青年最多，也是最

能理解他们的。正因为如此，他对学生青年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涉及面也是十分广泛的。

周恩来对学生青年的特点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和概括，他认为：学生青年在政治上突出的特点是“比较单纯”。（《年纪大的人也有他们的长处》）这是同成年人相比较而言的。学生青年受旧社会、旧观念、旧传统和旧习惯的影响相对比较少，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纯洁可靠，可以信赖。在思想上，学生青年不仅“能够接受新鲜事物”，而且“接受新鲜事物来得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重视成人教育，培养建设人才》）这是说青年人思想上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不因循守旧，思想解放，敢想、敢说、敢干。在精神上，学生青年的突出特点是“朝气蓬勃”和“富有朝气”。（《关于体制问题》、《跟着新生力量走》）在工作上，则“热情奔放”，“积极肯干”。在生理上，突出的特点是“精力旺盛”，“脑筋发展最快”。（《应该确立社会主义人口论的正确观点》）在年龄上，则正处在“年青力壮”，“有为的时候”。（同上）因此，他们“不仅有今天，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所以他说，青年人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为祖国锻炼身体》）

周恩来不仅充分肯定了学生青年的优点和长处，热情勉励他们发扬这些优点和长处，而且还时常提醒他们要认识和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之处。他提醒青年要注意到，由于他们缺少政治斗争的锻炼与考验，缺乏社会经验，因而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一面；也指出了他们的思想容易“波动”的弱点和工作上往往因为“活动过多，负担过重”导致他们“健康状况不良”的问题。（《重视青年一代的健康》）

此外，周恩来还特别论述到了学生青年正处在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学习走向工作的重大转变时期这一突出的特点。

针对学生青年的上述特点，周恩来指出他们需要处理好几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首先，现在的学习是为了将来做好工作打基础的，因此，他希望学生青年“要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气，要经常地向三个方面学习”：“一是向群众学习”，“二是向书本学习”，“三是要在实际斗争中学习”。总之是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其次，将来的工作也离不开学习，因此他鼓励青年们要在工作实践中继续坚持学习，要“根据以往的那点根基，去发扬光大，去使理论适合于实际”（《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还极力提倡“自修自学”，说这样“也可以培养一批人才”（《自修、自学也可以培养一批人才》）。他强调，只要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

二是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学生青年无论在校或参加工作，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而且往往是理想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距离。因此周恩来认为，学生青年首先是要树立革命的理想，要看到光明的前途，绝不能“因为家庭担子或个人问题而庸庸碌碌”（《跟着新生力量走》）。但是另一方面，理想也不能脱离现实，“不要只看明天，而逃避今天。”那样就会成为“脱离实际的空想”（同上）。他提醒说，“每个人一出校门都感到非常美满是

不可能的”(同上)，“不要一接触实际，碰到问题就失去前进的信心”(同上)。他说，“只有把理想与现实两者结合起来，不脱离现实，而又看到前途，这样，我们的方向才会更明确起来”(同上)。

三是要处理好青年人与老年人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学生走出校门进入社会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周恩来主张青年人和老年人“要看到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要彼此尊重、互相学习。他认为重点是青年人要正确看待年长的人。因为“青年人的成长是老一辈亲手培养的”，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老马识途”，在实际工作中“带路的是老的”。所以“首先要教育青年”“尊重老年”。(《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特别提到青年人要学习老年人的长处，不能学老年人的短处。他对一些青年不深入实际喜欢坐办公室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周恩来也指出老年人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老年人要教育年青一代”，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还特别提到老年人要放手大胆地让青年人开展工作，“要给他们一定的权”。总之，他强调指出只有青年人和老年人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老年人“才能朝气蓬勃”，青年人才会更成熟，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四是要处理好恋爱婚姻和家庭的问题。周恩来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向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恋爱婚姻和家庭观提出了勇敢的挑战。他核心的思想是反对没有真正爱情基础的婚姻和家庭。他认为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撮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的。他认为择偶的标准不是攀龙附凤，也不是才子配佳人，而是要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并且要有利于革命工作。他婉言谢绝一位校长以“千斤”相许的垂爱，拒绝了旅欧时期一位美貌女子的爱，最终选择了邓颖超作为自己终生的革命伴侣，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正是从真正的“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经过了长期革命考验的，是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邓颖超曾因自己不能再生育多次劝周恩来另娶一位夫人，他不仅坚决拒绝了，而且对她爱得更深，更切了。已经公开发表的和尚未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件就足以作证。

周恩来还主张青年人要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并且从建国初期开始他就一直在积极倡导着。他认为“人的精力最饱满的时候，是二十至三十岁这个脑筋发展最快的时候。”(《应该确立社会主义人口论的正确观点》)青年人“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利用大好时光增加知识，学点本领，努力劳动，所以最好是晚婚，……至于结了婚的，就应该计划生育，就要节育。”(《谈谈青年的学习和生活》)他是从保护母亲的健康，优生优育，“为了我们人民生活的幸福，为了长远利益，也为了后代”才向青年们提这个建议的。他也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的侄儿女们的。

周恩来认为处理好家庭问题的关键是丈夫要多关心体贴妻子，要尊重妻子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要积极主动地分担一部分家务负担。他和邓颖超从三四十年代开始就倡导夫妻“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的“八互原则”。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曾经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对自己的侄儿女们说：“你们七妈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而我们周家却是一个大家庭，她这一辈子全都为我们周家服务了。”(《忆邓大姐》)

周恩来还特别谈到青年人应该赡养老人的问题。他说，“谈到赡养老人，我们有些青年团员也许会问：‘难道现在还要我们讲孝道？’”他强调“对

‘孝道’要做分析，要辩证地看。”他说，“在新社会，家庭不再束缚我们了，老一代曾经哺育我们成长，我们就应该赡养他们。”（《谈谈青年的学习和生活》）由此可见，在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上，周恩来是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同共产主义道德观完美结合的。

从周恩来的这些论述中还可以看出，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希望学生青年能够“学得更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希望他们“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

世界上没有完人， 永远没有完人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看到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这句话，对于当时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们来说，的确是太新鲜了，也不大容易接受。因为当时在人们的头脑里始终是认为有“天生的圣人”的。譬如中国的孔圣人——孔丘、佛祖默罕默德·释迦牟尼，还有基督救世主耶稣等不就是吗？但是周恩来却说没有。非但没有，而且说谁要是这样看自己并且喜欢别人这样看自己，那就会“危险之至”，这不是危言耸听吗？当然不是。

何谓“天生的圣人”呢？自然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了。这样的人古今中外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呢？看看本世纪初还是学生的周恩来是怎么看的吧。1916年5月15日他在《诚能动物论》这篇作文中写道：“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其能以一己之所行所言，范围世界之人类，虔心信仰，莫余外者，仅得数人焉：儒之孔、西之耶稣、佛之释迦是也。”“三子以为人类之表率”，可以说是真正的“圣人”了。但是，“夫三子亦犹人也，贵未及于天子，富未比乎陶朱，享寿亦若中人”，一句话，他们不也和普通人一样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嘛！所以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更加明确更加肯定地说，“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古今中外，“哪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学习毛泽东》）实践证明，凡是不这样看自己的人都会走向反面。王明不是标榜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他不承认自己有错误，结果不是走到革命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吗！张国焘不是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只有他才代表“真正”的党中央吗？结果不是成了革命的可耻叛徒吗！林彪不是公开说他是“天生的圣人”吗，结果不是政变失败，叛逃国外，摔死在蒙古草原吗！

周恩来提出“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是他科学人生观与世界观的生动体现。他对自己的观点始终坚信不移，坚定不移。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对这个观点作过许多生动的阐述。

他认为人不可能“生而知之”，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生而知之”的人。他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说到：毛主席“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毛主席也不赞成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

道。最可笑的是林彪一伙，在 30 年后竟大谈特谈“生而知之”了。然而，他们怎么不知道自己很快就摔死在温都尔汗呢！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吗。周恩来还进一步分析说，“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他援引中国一句古话“学然后知不足”，结合自己的体会说，“越学越感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他在 1957 年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来的。他还说，“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懂，是个全才。”他以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为例说，“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他还说，“我们讲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实践，是说每个人不可能懂得所有的事情。”（《要重视技术力量》）这说明，学识渊博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也只能熟悉他们专业内的知识，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郭沫若可以说文学、历史、考古、艺术、诗词、书法、戏剧等方面都有卓著成就的人了，但是他也不是“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更不是“生而知之”和“无所不知”的人。

不仅对科学家应该这样看，周恩来认为对领袖人物和先进人物同样也不应神化。他说，“现实中没有神化人物”，（《看 豹子湾战斗 后的谈话》）现实中的领袖人物和先进人物，其实也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同上）如果把他们神化了，他们也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他们自己也就“没有发展了”（同上）。他谈到毛泽东时说：“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那样，“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学习毛泽东》）他从实际出发分析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关的，是和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同上）这说明，毛泽东成为人民的领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不是天生的；而人民接受他为领袖也有一个认识 and 选择的过程。

人之所以不能成为“生而知之”者，不能成为“全才”和“完人”，周恩来认为基本原因就在于人和时代都有局限性。他说，“任何人都有局限性，都不那么完全。没有绝对正确的人。……一个人总有长处和短处。……说一切都好，世界上没有这种人。不承认英雄有缺点，这不合乎毛主席思想，不合乎辩证法。说一切都正确，那就会骄傲，就会垮台。”（《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同样，任何时代也有局限性。时代总是发展的，变化的，进步的。所以他借一句古语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因此应该懂得，“我们今天也有局限性。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被后人看来也会是很可笑的。（同上）

周恩来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分析这个问题，他说任何事物本身都存在矛盾，“事物本身总有长处和短处”，“事物没有矛盾，就不能前进。人类没有矛盾，人类就消灭了。世界没有矛盾，世界就毁灭了。”（同上）所以结论只能是“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

周恩来强调“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是不是全盘否定领袖人物，全盘否定先进人物呢？绝对不是。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就是毛主席。”（《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毛泽东是在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学习毛泽东》）。他还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

领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我们的一面旗帜”，我们就是要“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同上）

所有的人都要自我改造

周恩来是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要自我改造”这一观点的。既然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也不可能有完人，那么进一步提出所有的人都要自我改造这个命题，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事实也是如此，他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就已经谈到“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他这一思想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周恩来提出“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要自我改造”这个命题是严密而准确的。他说的是“自我改造”，显然是指人民内部的自觉的改造行为，不包括对阶级敌人和人民内部犯了法的人被动的改造行为。因此，“所有的人”就自然是除这些人之外的人了。这里的“所有”自然是指人民内部包括各个年龄、各个职业、各个文化层次和各个职务层次中的所有人了。既然如此，“自我改造”的内涵和性质也就明确了。从周恩来大量有关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说的“自我改造”主要是指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所要改造的个人的主观世界，即人的思想，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然也包括人的思想观点、思想方法和政治立场。这正如他在1961年6月的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所说的，“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关于自我改造的性质，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讲得很清楚：“改造在性质和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就是说，性质都属于人民内部的范畴，但由于分属不同层次，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孩子，教授和工人、农民，文盲和中小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与部长、科长，自我改造的程度当然不会是一样的。但有一点还是相同的，就是改造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个人头脑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旧习惯势力影响，以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一句话，“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论知识分子问题》）。“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因此，自我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光荣的事情”。（同上）

周恩来对“自我改造”的特点做了深刻的分析。

他指出自我改造需要自觉。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提出这一看法后，又在1963年初召开的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做了阐述。他说，“只有认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才会愉快。不自满，有了缺点就改，就会进步；如果自满了，那就要退步。人总要不断地前进。”因此他强调要“自愿地坚持自我改造。”

自我改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专门改造别人的人。既然是自我改造，所有的人都要自我改造，当然就不存在专门改造别人的人了。道理虽简单，但作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周恩来对那些不进行自我改造，专想改造别人的人说：“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因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

自我改造的又一个特点就是也需要互相帮助。周恩来强调没有人是专门

改造别人的同时，也指出了“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他进一步指出“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论知识分子问题》）

周恩来还谈到自我改造需要一个过程这一特点。他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就是长期在党内锻炼的同志无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见得那么巩固”（《论知识分子问题》）早在建国初他就结合自己的体会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进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周恩来指出自我改造是没有止境的特点。他分析说，“由于事物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所以人思想认识和思想改造也是无止境的。”（《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他还谆谆告诫大家说，“作为一个党员、革命干部、共产主义战士，要永远承认两条：一、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穷的，学到老学不完，直到心脏跳动停止，你还学不完；二、社会总是在过渡中，我们把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把剥削社会过渡到无剥削社会，因此，人也永远要处在改造中。”（《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提出了“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的著名观点。（《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周恩来还指出了自我改造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他指出自我改造离不开学习和实践，“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思想，不可能自发生长出来，必须经过长期的自觉的锻炼。”（《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此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通过理论学习这样三条道路进行自我改造。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周恩来还强调自我改造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要坚持循序渐进的方法。这是同自我改造的特点密切相关的。他分析说，人的思想转变必须要他本人自觉才行。旁人用粗暴的方法对他进行思想改造，是不会解决问题的。因此，“要和风细雨，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论知识分子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不合乎实际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所以，自我改造还“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同上）地进行。

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

“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这是周恩来一向奉行的作人原则，也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这句话是1951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提到的。他所以这样强调是有原因的。从他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一是为了改造旧思想，达到个人不断进步的目的。他说，“为了改造旧思想，就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逐渐进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要改造旧思想，就得解剖自己的思想，这是因为无论生在旧社会还是生在新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受过旧思想的影响，脑子里多多少少存在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说话做事如果不多加思考，就常常会出偏差，

甚至有时会发生大的错误。”（同上）因此，只有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才能不断地清除自己头脑中旧思想的影响，保证自己不犯或少犯错误。周恩来还从人思想发展的规律来认识这个问题。他说，“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反之就不那么容易了。人要自觉地认识这一特点，做到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自觉地检讨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就大大减少了犯错误的机会了吗？其次，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才能“便于取得别人的帮助。”因为，任何人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离不开集体。周恩来分析得好，他说：“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时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而他的短处或弱点也正在这个时候才会彻底暴露。”（《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以他主张“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见病不治，更不能讳疾忌医。”（同上）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既能促使自己进步：又能帮助别人进步，达到团结的目的。因为你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别人就可以从你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和教育。同时，“人家看你作自我批评，他也会作自我批评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消除彼此的误解和隔阂，促进团结。所以周恩来强调“为团结起见，为了进步起见，应该以身作则，先从自我批评开始。”（同上）

周恩来还针对一些人的顾虑分析说：“那么，这样做是不是个人就失掉成盾，工作就很难做了呢？是不是有人会说，‘看你这个人，原来是这个样子，满寻疮疤！’于是不愿跟你接近了呢？……这不要紧，这正可以促进你自己的反省。等到人家改变了态度欢迎你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安慰，彼此之间就会团结得更好。”（同上）

他十分赞赏中国古代曾子经常自省的精神，他说，“中国古代的曾子尚且‘吾日三省吾身’，常常想想自己，何况我们。”（《跟着新生力量走》）他还说，“应该努力反省。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周恩来正是以这样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的。

周恩来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当众作自我批评。对此，熟悉他的人都已司空见惯了。每当他回顾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时，他总是要谈到自己所犯的 error 和所负的责任。例如他在谈到党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左”右倾错误时，就坦率地说：“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每当总结工作分析成绩与问题时，他总是先从自己的经验教训谈起，主动承担责任，减轻下层部门及各级负责同志的精神负担。例如他在总结五八年“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时，就直截了当地说：关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中央主要是书记处和政府部门，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在中央周恩来是副主席，在政府他是总理，做具体工作的也主要是他，可见，他讲这样的话是主动承担责任的。他还说，有些事情发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调查，摸得不细，心里没底。因此，不能及时向主席提出，也就得不到解决。问题就是“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这

样一讲，上替主席解脱，下为各级干部解脱，这种高风亮节的品德，怎能不令人佩服呢！每当他动员别人进行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时，他也总是以自己的经历和体会现身说法，典型诱导。他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就多次以自己的家庭、历史和经验教训为例，说明改造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使人们听了倍感亲切，深受激励。每当他做青年的思想工作和进行青年运动的传统教育时，他也总是把自己青年时代探索革命真理的坎坷经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讲给大家听……总之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周恩来提出“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不仅是对大家的，更是对他自己的。因为他从来就是一个言行一致和严于律己的人。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是周恩来在1962年2月3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时说的。这是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也是他对个人的经验体会和我们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映了他一贯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前几年工作的经验，纠正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周恩来的讲话就是针对“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的。在这次讲话之前，他响应毛主席在1961年春天提出的领导干部要亲自搞好调查研究的号召，利用陪外宾访问和工作之便视察了武汉、南宁、重庆、成都和上海等地的工作，并先后多次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和天津地区专程搞调查。因此，他对党内出现的说假话和浮夸等不正之风的严重性和危害深有体会。他极为感慨地说，“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他对此表示“很痛心”。

周恩来提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映了他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人生观，也反映了他一贯严谨务实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他提出这四句话，并不是不要人们说话，鼓劲和做事，他所反对的只是那些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或不说话；假使劲，强使劲，瞎使劲或不使劲等，种种弄虚作假和不实在的现象。坚持两点论，同时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是周恩来一贯的思想特点。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就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提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踏踏实实，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1953年6月，他针对当时经济建设中第一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现象，提出了“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忠告。1956年6月，他又针对经济建设中更大的急躁冒进提出了“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讲话十多天后，他又讲了一段话，他说：“不要急，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急躁冒进，也不要右倾保守，要逐步实现，不要一步登天。”（《关于体制问题》）这句话虽然也讲了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但他讲话的重点已经十分明确和突出了。在他看

来，我们搞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当然要调动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与创造性，需要热火朝天地大干社会主义，但是，他同时认为“应谨慎”，“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他认为那样做“就很危险”（同上）。“反冒进”遭到批判后，导致“大跃进”，说假话和浮夸风严重泛滥，证明周恩来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这样的话，并且不怕各种压力和对他的错误批判，表明他是出以公心。出自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责任心。他说，“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办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提出这四句话，绝不是要束缚人们的思想和手脚，恰恰相反。他说，要求人们“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同上）“我们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他强调这四句话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他说，“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这就是他经常强调的，把“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把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认为要做到这四句话，必须从两方面努力：“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要学“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其次要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搞好调查研究。总之，做到这四句话，纠正不正之风，是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要戒慎恐惧地工作”，是周恩来在1943年4月22日写的《怎样做一个领导者》中提出来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他不仅多次谈到这一观点，而且始终把它看作自己信守的重要处事原则。

“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他常说，对待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工作，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对待，要有“临事而惧”的精神。他说，“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因为“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认清形势，掌握主动》）建国初期他就谆谆告诫大家，“新中国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国家应有责任感，这样才能涌现出成千成万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人员。”（《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由此可见，他提倡“临事而惧的精神”，提倡“戒慎恐惧地工作”，并不是要人人成为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君子”，而是要人们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前提下去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认真负责谨慎地开展工作。这就必须要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这就既不能“采取草率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是应该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周恩来提倡要谨慎地工作，并不是说在工作中就一点错误也不能出，这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应该怎样来看这个问题呢？他说，“我们每天做工作，总是兢兢业业，生怕做错了。如果不深思熟虑，事情做错了，对人民就很不

利。所以，一定不要骄傲，遇事不要急躁。”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过，“当然不能说在工作中就毫无错误，但是我们不要怕，要在工作中好好学习。”（《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后来，他说的更清楚了：“一点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错误越小越好，知错马上就改就好”。如此看来，周恩来强调的是对人民负责，每项工作要兢兢业业，深思熟虑，尽量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要尽快改正。周恩来曾多次讲过，在他所担负的工作中，他最担心的是两件事，一个是水利，一个是“上天”。他对这两件事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就因为这两件事既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眼前利益，又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稍有疏忽就可能铸成大错。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他抓这两件大事始终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抓规划，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从未放松过。

“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充分反映了周恩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就提出要学习列宁的工作作风，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学习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把“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同“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结合起来。这就是他一向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十分推崇鲁迅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对任何一件小事都不苟且”。他自己也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最突出的事例是池领导我国两弹一星研究和试验中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他每次主持专委会会议，听取研制、试验情况汇报，对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常常提出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都没有想到的问题，从而保证了研制试验工作的万无一失。由他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至今仍是我国国防尖端部门严格遵循的工作方针。

“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充分反映了周恩来深思熟虑躬行实践的工作方法。事实上，它既是工作态度，又是工作作风，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这就是周恩来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周恩来提倡“要戒慎恐惧地工作”时，总是讲要“深思熟虑”，“还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这是一种缜密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在讨论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这件事上，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是1962年12月，当时三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除了几项重大外事活动外周恩来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任务，但是他仍抽出时间来同有关同志研究召开治理黄河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亲自主持了这个会议。他原来还打算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到现场去实地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但始终没抽出时间来。会议期间，他多次到会并仔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他在最后结论时，仍然强调，“黄河治理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到现在将近十五年了。但是我们的认识还有限，经验也不足，因此，不能说对黄河的规律已经都认识和掌握了。”（《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他要求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同上）

周恩来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戒慎恐惧地工作着。

我们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怎样看待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人民群众，这是人生观与世界观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周恩来认为，我们国家的所有干部，无论其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反对官僚主义》、《克服目前闲难的主要办法》）。都应该“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同上）这充分说明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干部的一切是人民群众给的，干部应该一切为群众着想。他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不仅论述了毛泽东与中国人民的这种关系，而且特别赞颂了毛泽东坚定不移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这一根本之点。他赞誉朱德的也正是他“为党为人民真正忠贞不贰”的高贵品德。他称颂王若飞等革命先烈的正是他们那种“为国奔波，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牺牲精神。

周恩来谈到我们的干部要当好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必须有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他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原则立场。他强调，“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也就是说，要照顾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周恩来提出，要善于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同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要时时为后代子孙着想。

周恩来还谈到人民公仆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群众，“反对特殊化作风”。他一贯坚决拥护并模范执行和维护党中央关于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和企业的名字等歌功颂德的作法的规定。他不准在展览中宣传他，不准开放他的故居，不准为他建纪念馆和塑像。他也十分注意时时处处以普通劳动者出现在群众中。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他接着说，现莅“‘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所以，他总是警惕自己，绝不搞特殊化。他外出一向是轻率简从，坚决反对如临大敌把领导者同群众隔离起来的保安措施。他每到一地，坚决拒绝住豪华宾馆，坚持住招待所。他经常找帆会深入基层和群众谈工作，拉家常，亲亲热热，无拘无束。他把特殊化作风视为旧习惯势力深恶痛绝予以反对。

周恩来经常强调我们的干部必须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他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他总是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能自视过高”，那样会脱离群众。他现身说法启发大家说，“就拿我说，你要有一两年不底下去，就会和群众有隔阂，许多群众的事情就会不晓得了。”（《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领导干部的办法和智慧都是从群众中来的。“政治家就是能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制定政策”。在周恩来的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群众，处处想到人民群众。所以他总是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做工作要“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凡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

若干主要问题》)。还要“经常注意爱惜民力和时间，不要随便增加人民的负担。”(同上)

周恩来强调我们的干部必须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反对官僚主义》)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带头吃粗粮，带头节衣缩食的事迹早已成为我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佳话。为了调查和解决乘车难的问题，他亲自去挤车，同普通乘客亲切交谈。1961年4月中旬，他陪缅甸总理吴努访问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首府允景洪，正值傣族人民欢度傣历新年。为了与少数民族同胞共庆佳节，周恩来换上了傣族服装，同傣族同胞一同跳起象脚鼓舞，开始最热烈的泼水活动后，他也同大家一样用伯枝蘸着银碗里的清水与少数民族兄弟相泼洒。后来少数民族同胞为表示对总理的亲热和尊敬之情改用大盆往总理身上泼。他怕扫大家的兴，坚持不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在前面拦挡……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接连两次发生强烈地震。3月8日第一次地震发生的当晚，周恩来得报告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组织救灾工作。第二天向党中央、毛主席书面报告灾情及应急措施后，便不顾余震危险赶赴灾区现场视察慰问，领导抗灾救护工作。3月10日又赶到受灾最严重的震中地区白家堡村慰问受灾群众，8月12日至16日周恩米在天津参加华北局会议期间，还多次找有关同志谈抗震救灾工作。8月22日第二次地震发生，当时他正忙于几项重大的外事活动，几天后，当他能抽出身来时便立即赶赴灾区。8月31日到石家庄了解情况，第二天就赶到宁晋县东汪公社临时医院一个一个地连续慰问了140多位伤病员。这一天他连续视察慰问了宁晋县的东汪、耿庄桥，巨鹿县的何家寨，冀县码头李和邢台市等地，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未进一粒米。4月2日又赶到邯郸了解灾情和救灾工作，3日上午到魏县漳河，下午到大名前桑园，晚上就吃驻在大名，第二天又到临彰县的南岗、后赵坦，晚上到了成安南王庄，又赶回邯郸。5日上午视察岳城水库，下午赶到磁县，当晚还与省、地区及中央的有关同志座谈，午夜12点才踏上返京之路。他就是这样，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的忧与乐。

周恩来认为人民的公仆、勤务员，就应该像牛一样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他热情赞颂鲁迅先生“伏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主张学习鲁迅“像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他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对待人民群众“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他还热情颂扬了毛泽东一家数人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他自己也正如牛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地为人民辛勤工作的。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极特殊的环境下度过的，他一方面要苦力支撑着被极左路线冲击得千疮百孔的国计民生，一方面还要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明里暗里的激烈搏斗。很多人都为他担心。他却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精神鞭策自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继续斗争。在他的病情一日重于一日的弥留之际，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的四化建设和统一的大业。他想的是怎样攻克像恶魔一样威胁人民生命的癌症。他对自己的后事想到的还是人民：他坚持遗体解剖，要为癌症研究和医学发展作最后一次贡献；他坚持遗体火化不留骨灰，撒入祖国山河大地，想的是不与活人争地，骨灰化作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光辉的一生，是寻求高尚完美人生的一生，是完全彻底无私

奉献的一生。

我们的先人修身浴德讲究“宏兹九德”。九德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疆而义。”（《尚书·皋陶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恢宏发扬这样九种德行：宽宏大量而能严肃恭谨，性情温和而能有主见能立事，老实谨慎而能恭敬端正，能排乱解纷而又小心慎重，柔顺驯服而能坚强刚毅，挺直端正而能和善宽厚，质朴平易而能清正廉洁，能刚断事理而又有节有制，刚正强直而能容止适度。然而，纵观华夏历史，悠悠数千载，真正能“修成正果”，九德兼备者谁？实在是凤毛麟爪，难寻觅！“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今朝，20 世纪的中国，能“宏兹九德”者，恐若周公恩来首鲜矣！有冰心老人 1988 年 1 月 31 日的话为证：“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是的，尽管人们知道世上无完人的客观真理，但是，人们还是愿意用“千古完人”、“万代楷模”一类的颂词赞誉他那超凡脱俗的完美人格。

这正是：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
我辈复登临。”

——唐·孟浩然《与诸子登岷山》

后 记

周恩来光辉的一生为世人所称颂。西方人赞誉说：“除了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之外，也许周恩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那光辉的品格。”“周恩来具有许多难得的品德，而像他那样的德才兼备于一身，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政府首脑中都是罕见的。”（《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人颂扬他“功高才高德更高，万古师表绝代豪”。说他“雄伟战斗的一生，就是一部读不完看不尽的宝贵经典。”（《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向人们展示这部“读不完看不尽的宝贵经典”，弘扬周恩来光辉的人生思想，正是本书的根本宗旨。

本书收录了周恩来本世纪初至 70 年代关于人生问题的论述，其中文章摘选 31 篇，语录选抄若干条。已收入文章摘选的言论不再作语录选抄。周恩来早期的论述，均按首次公开发表的刊物校刊，其他部分，均按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出版发行的著作校刊。所选言论，力求完整准确地反映周恩来人生思想的精华。

附录《周恩来人生九题》采取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方法，从最具特色的九个方面论述了周恩来探索完美人生的光辉思想与实践。

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选编。赵春生同志负责全书的文稿选编工作，刘武生、曾自同志审读了全部文稿。

编者

1994 年 7 月 1 日

